

李廣平著

二十年來之中共

正義出版社印行

MG
D231
16.



3 1797 8075 8

序

首先要告訴讀者，我作這書的動機：是爲毛澤東先生一篇演說辭所引起。

毛先生在延安幹部會上講「改造我們的學習」。大意是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是馬列主義的普通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二十年。現在的中共，對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認識，比從前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但還有很大的缺點。就研究現狀來說，對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就研究歷史來說，許多黨員，對於本國歷史，是漆黑一團，一點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就學習國際革命的經驗來說，祇能背誦馬、恩、列、史的教條，而不能應用，祇能起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因此，他在最後，提出三項意見：（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二）對於中國近百年史，聚集人材，分工合作研究。（三）對於任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爲中心，以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

毛氏是中共現在領袖，他的話是一呼百應，從此看來，中共今後對於周圍環境及過去歷史，將作系統而周密的研究了。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二十年來，中共對於國情，固然沒有認識清楚，對於本身力量，時亦估計錯誤，雖然沒有一敗塗地，大致是失敗的。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中共的二十年歷史，也須要旁人代為研究吧！

因為中共的鬥爭方式，大都是採取秘密方式，國人對於中共，一向是不能瞭解，有人稱他是進身份子，有人說他是漢奸土匪，他的真相如何？也是國人所欲知和必須知道的。

瑟諾博司說：「歷史之為學，終不免為一種主觀之科學。一凡編著過歷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這一句話，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在幫助國人，明瞭中共；幫助中共；明瞭自己，材料的選擇，是相當謹慎的，然欲成歷史，又怎能免去主觀？不過是沒有成見罷了。」

任何科學家，都不認求其工作成為永久不易的形式，亦未嘗希望長留不易以貽後人之誦習，或獲得其個人之長久不朽。他們所自以為滿足的，是在他們所探討而得之結果，能由後來之繼續探討者加以補充修正，因頭積聚一種智識之資財，以留供人類科學上之繼承享受，即為滿意。我作這書，亦是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李廣平自序於西安

篇次

一	中共之革命理論（上）	一
二	中共之革命理論（下）	二五
三	中共之民族政策	四四
四	中共之外交政策	五一
五	中共之經濟政策	五八
六	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關係	六八
七	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之態度	七八
八	中共之戰略與策略	八五
九	中共之三十六計	一〇〇



中共之革命理論（上）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一必須有正確理論領導的黨，才能完成前衛戰士的使命。」中共以馬列主義著自命，向來以懂得理論自詡的，要檢討他的行動，必定要檢討他的理論。

中共所信仰的是馬列主義，馬列主義，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抗戰初起，中共曾經鄭重宣言：「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三民主義，既為中國今日必需，則馬列主義，必非中國今日必需了，馬列主義，似可置之不論。因為毛澤東曾說：「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自己虔信多年並為之犧牲奮鬥多年的共產主義。」又說：「在中國，任何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同時具有現時實際任務與將來遠大理想兩種責任的。……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產主義，這是人類最美麗的社會制度。……所謂現在的實際任務，就是三民主義。……」又說：「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底特性。」毛澤東是中共現在的領袖，他的言論，可以代表中共一般人的意見，依照毛氏這話看來，中共也知馬克思主義在客觀上不適用於中國，不過主觀上並不願將他放棄。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雖非中國今日所必需，在將來仍可實現，雖不能生吞活剝，毫無批判地吸收，仍可具體的具體的應用發揮。馬列主義，仍是中共思想上的重心，應當首先論述。

一、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他的一切主張，都是針對當時社會病態而發，然在十九世紀，竟未實行。到二十世紀時候，資本主義極端發達的國家英國美國，並未如馬克思所料，發生社會革命，而產業不很發達國家俄國，卻由共產黨握了政權。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然共產黨是絕不因此而動搖其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有價值的，既自有其哲學體系，而又能應用於現代社會的，不管其適用之範圍程度如何！

依據共產黨人意見，馬克思主義主要部份：有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勞動價值說與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和階級獨裁等項。

辯證唯物論，認為宇宙萬物，一切變化，都依照下列三個法則進行。一是對立之統一與交流，例如晝與夜；陰電與陽電，正數與負數等，二是由量到質，例如水到白度成汽，三是否定之否定，例如麥粒入土，變為麥種，自身隨即腐爛，為第一次的否定，及新麥谷種長成數十粒乃至數百粒，而麥的本身又枯朽，為第二次的否定，經一次的否定，即有二次的進步，這種否定的意義，是和黑格爾邏輯中正、反、合中的合，是一樣的。不過馬克思的意見，認為這種定律所根據的本體，不是精神而是物質。以物質為宇宙的本體，宇宙的一切現象，都是由物質派生而來。這是他和黑格爾大不相同的地方。

據我看來，辯證法三原則，可以說明一部份宇宙現象，而不能說明一切現象，對立統一，不是什麼地方都存在的，例如正數負數是對立，但統一在什麼地方呢？真偽是對立，他的

統一，又在什麼地方呢？水到百度變汽，算是由量變質，但其化學性質，並沒有變。由一粒抄到一萬粒沙，量變了，質又是否隨之而變？宇宙萬物，變質的原因，是否全在量呢？由卵變雞，是否定，變了母雞，算否定之否定，但變了一隻公雞呢？世界一切，都在運動之中，他的運動方式，不是上面三個原則所能包括，是很顯然的。辯證法之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愛好，在其為「反」之哲學，「凡是現存的，都值得毀滅」，作為反對現社會之理論，作為階級鬥爭的哲學，沒有比他更好，恩格斯在其「費爾巴哈論」中說得十分明白，他說：「在辯證法之前，並無永久適合的東西，一切現存的，除了生滅過程外，並無其他。」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之喜用辯證法，與其說是為其體系之完美，毋寧說是為其應用之便利。

唯物論和唯心論是哲學上爭論不清的問題，依照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所表示的意見：「從來一切唯物論之主要特點，即僅在客觀與直觀之形式下，去把握對象。」「現實界——感覺界。而不是看作感覺的人類之行動與實踐，即不是主觀的把握對象。」「現實界——感覺界的。」如果馬克思的唯物論思想就是如此，我認為他和先驗觀念論在某些地方並無分別，因為先驗觀念論者，認為我們的經驗或我們的知識是一方面，於外界的反映，一方面也參入了我們的主觀作用，和馬克思關於認識的意見，是一樣的。先驗觀念論的創始者是康德，馬克思這種思想，當然是與康德有關。再以唯物辯證論來說，唯物論與辯證法之間，本身就具有矛盾，據馬克思主義者說，辯證法是萬世不變的法則，這法則當然是思想之一種，如果根據唯物論的解釋，則思想是隨物質而變的，馬克思既認為物質是不斷變動的，那末又

65
優越說辯證法是永遠不變的呢？所以先驗觀念論在某些方面，比唯物辯證論，說理更爲圓滿。

四

所謂歷史唯物論，是把唯物辯證論適用於社會的認識的理論，所以歷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論並不是兩個不相同的東西，不過據馬克思主義者說，唯物辯證論可應用於宇宙人生萬般的事物上，而歷史唯物論則是特對歷史的變化而移，應用唯物辯證論的一種看法。這個理論，承認人類之社會意識而獨立的社會的存在。所謂社會的存在，是人類現實的生活的過程，是人與人在生活資料的生活過程中發生的互相關係。換句話說，即是社會經濟的構造。所謂社會意識，是一定的社會階級或職業的集團所具的感情思想，或學說，換句話說，社會意識，即是在意識中被反映了社會的存在，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而社會制度，又是社會意識的表裏，所以，社會制度決定於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決定於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是社會發展決定的力量，也就是歷史演進的重心。所以塞利格曼教授，把這個理論叫做經濟史觀。

關於這個理論，我認爲經濟元素，祇是構成歷史變遷的重要因子之一。班茲在其所著「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中批評經濟發展之階段說道：「經濟生活中之階段，是若干因素交合錯綜之一大混合物。任何元素，均無獨占性與超越性，足以掩蔽與壓倒其餘一切之原素，而且經濟混合中之原素，爲數甚多，兼又龐雜，至於文化混合物，則當更甚，蓋其所包括者，不僅有經濟因素，而且有極重大之心理與社會因素，常常劇烈地改變社會內經濟元素之性質與作用，經濟制度之一般社會背景頗爲重要，茲舉一事實以例解之：試以一種工藝或經濟法則

，使成爲互異之文化混合物之一部分。則將發生迥不相同之影響，互異之文化混合物，包含心理性質之不同，文化態度之不同，社會制度之不同，政治策略之不同，同一之經濟與工藝條件，斷不至生產同型之文化與社會，吾人一考查現今之世界，便可以知之也。」塞利格曼在其所著經濟史觀也說：「我們不祇有經濟的需要，並且也有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和許多別種集合的需要，我們不祇有集合的需要，並且有個人的需要，如肉體的、工藝的、美術的，科學的和哲學的需要。」「沒有人肯主張語言的或美術的各種表現都是由於經濟狀況，更沒有人肯說，純粹科學的各種形式和普通社會情形，有何等密切的關係。人之所以爲人，是因爲心理進的緣故，並且就是他的物質的需要，大部份也以他的心理的變化爲轉移的。」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是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說的繼續，二者之間，有一點小的不同，就是李嘉圖以勞動量爲決定商品價值之相對的標準，而馬克思則以它爲絕對的標準，卽以一切勞動遠兀爲單純勞動以決定這個商品包含這個單純勞動的幾倍。有一個基本差異，就是李嘉圖根據了他的勞動價值說而主張社會的全體生產物，應當歸於全體勞動者，這個主張是以倫理觀念爲基礎的。馬克思是主張經濟必然論的，他以爲社會的一種社會形態之形成與消滅，全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的結果，沒有什麼應當不應有的問題，所以恩格斯說：「馬克思決不將共產主義建立在倫理觀念上面，而建立在表現於我們的面前的資本制生產崩潰的必然性上面。」這就是說，在資本制生產沒有達到崩潰時候，社會的全體生產物不盡歸於全體勞動者。

乃是勢所必然，也就是理之所在。

勞動價值說的主要內容，是認爲：二種商品的交換是由於生產這二種商品時，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所決定，而不是由他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不能比較的，可比較的是生產這二種商品的勞動量。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說：「價格是價值的貨幣形態，一個商品的價值，用金錢來表現的時候，就是這個商品的貨幣形態，就是價格。」又說：「各商品的價格，最初無論如何相互的確定或規定，而這些商品的運動，常常是被價值法則所支配，這些商品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假使減少，其價格便低落，勞動時間假使增加，其價格便騰貴，在各種情形之下都是一樣。」這個理論，有下列各缺點。一、以馬克思所說而推論之，出於自然恩賜之物，及一切無所費於勞力之物，必無價值，而凡成於勞力所成之物，則皆有其價值，實際情形，並不如此。二、今日市場物品交換，並不按照比例於物品生產所投下的勞動量。關於這種事實，馬克思也曾見到，因而有平均利潤率說的產生，以濟其窮。他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商品並不按照他的價格出賣，而是按照他的生產價格出賣，所謂商品的生產價格，就是成本費（投資總額）加上平均利潤，這話就是說商品的價格，並不爲價值所決定。馬克思自己否認了自己的價值論。因此諷刺，馬氏爲彌補其原先主張：又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個別商品，雖不依照自己的價值，而按照自己的生產價格出發，其在社會範圍以內，各個生產價格的總和，還是等於各個商品價值的總和。因爲一部分商品的價格高於他的價值，而另一部份商品的價格卻低於他的價值，可是總括起來，全體資本家是得到他們自己的商品

的價值總量的。所以價值法則，依然適用於資本主義制度。但這一個答覆，實際等於沒有答覆。因為價值問題，是存在於各個商品的交換之中；若把全體生產當作一個集合體來看，便不能顯各個商品相互間的交換比例，價值問題已不存在了。恩格思見到馬克思的價值論崩潰到無法救藥的地步，便在新時代雜誌，移動這整個論證的歷史背景，使馬克思的價值論離開馬克思自己發明他所能適應的時代，而使他應用於馬克思自己發明其所不能適應的時代，他說：「馬克思價值法則，是普遍的適用從有文歷史以來至第十五世紀止的一切經濟情形。」這真所謂欲蓋彌彰了。

剩餘價值說，完全是根據勞動價值說而來的理論，據馬克思的意見，資本公司投入生產的資本，有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兩種，所謂不變資本，是指用於建築物、機器及原料的資本而言，這部份資本，並不能造出剩餘價值。所謂可變資本，是指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資本而言，換言之，就是工資，只有這部份資本，才能夠生剩餘價值。因為資本公司購買了勞動力，也就是雇用了工人，決不允許工人祇生產等於他的工資的價值，否則他就無利可圖了。所以資本公司非要延長工作時間，加強工作效率，或減低工資，使勞動者在比較工資更多的價值不可的。這是馬克思假定了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對立，而沒有考慮到資本家和消費者之間的對立，完全忽略了資本家和消費者間不平等價值交換的存在，是和資本公司與勞動者間不平等價值交換的存在一樣的普遍，同時是假定了資本家可以任意榨取工人，而抹煞了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力量，對於決定勞動者工作時間上的影響。事實上各大資本家（企業

者），不但沒有盡量的榨取工人，如馬克思所說，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減低工人的工資，而且還在減少工人工作時間，增加工人的工資，關於這點，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舉美國福特汽車廠為例，證明馬克思剩餘價值說之非真理。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還有一個大的罅漏，就是馬氏認為不變資本不能產生剩餘價值。現在假設有兩個企業，資本都是一百萬元，一個企業是有最新式設備的機器工業，一個企業是完全舊的手工業，兩個企業的剩餘價值均為那個多呢？事實告訴我們，資本的有機結構愈高，（越是不變資本多可變資本少），則資本家的利潤率也就愈高。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的學說的中心，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統一法則，是階級鬥爭的哲學基礎。唯物史觀是階級鬥爭史的說明，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說，是具體的說明階級鬥爭之所以存在及其所以日趨劇烈的原因，沒有階級鬥爭，馬克思的一切理論，將不能使人瞭解其用意所在。

關於階級鬥爭的發生，發展，及其作用與結果，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與私有財產制相伴而生的，私有財產制愈發達，階級的對立，便愈尖銳，而階級鬥爭也愈激烈，至於階級鬥爭在歷史進展中的作用，馬克思認為推動歷史的是生產力，而生產力須通過階級鬥爭來推動歷史，故階級鬥爭便成為歷史進展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推動力了。階級鬥爭的結果，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在過去每次鬥爭的結果，不是社會全體革命的新建設，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所謂過去，就是指原始共產社會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但是階級鬥爭到了資

本主義時代，情形便有不同，因為在這時代，因產業的集中而有資本的集中，因資本的集中，資本家的數目便漸次的減少，結果只餘幾個巨大的金融資本家和生產資本家，而另一方面，手工業者，小商人，小企業家，小農等中產階級也迅速的淪入無產階級的隊伍裏，資本家數目日少，而無產階級人數日多。其結果便是無產階級佔了絕對的優勢。同時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機器排斥了勞動者，造出大批的產業預備軍，失業者的數量增加，改變了勞動者的供求的關係，當產業衰沉時期，有業的勞動者被預備軍壓迫而沉淪，而在興隆時期，有業的勞動者亦被預備軍所牽制而生活亦無法改善。這樣，便使得在業的勞動者生活條件日趨惡劣，勞動者痛苦日益增加，鬥爭的劇烈達於頂點，社會革命發生，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便告終結了。

關於這個理論，我也認為歷史上確有階級鬥爭存在，但這並不是社會進化的重心，巴勒拿斯基在他的馬克斯主義的學說基礎裏說得好！「無論過去和現在，人類歷史，決不能與階級鬥爭的歷史一致，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這兩者是相同的，因此不能不說他們是大錯誤了。」馬克思的信徒盧森堡對於人類歷史全是階級鬥爭史的話，也曾加以修正，他說：「我們關於人類社會的舊經濟狀態，差不多每年有新的發現，而這些研究，引起一個結論是：在過去幾世紀中，必定有一個長時期，未曾發生任何階級鬥爭，因為那時期中，一般社會上還沒有分裂成種種階級，也沒有貧富的差別，並沒有什麼私有財產。」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指出：「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不是

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只是社會當進化時發生的病症，這種病症的起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有這種病症的結果。何引起鬥爭？又在孫文說說長批評達爾文尚生存競爭的進化原則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比之馬氏，真是高明多了。至於馬氏階級對抗簡單化的語言，則和他的資本集中而財產所有權亦集中，的理論，同樣不合實際，因為美國近年經濟發展的結果，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反愈分散在民衆，資本家的数目既不覺漸漸的減少，而中產階級也沒有絲毫漸次消滅的現象。勞動階級，因生活改善財力進展的原故，甚至放棄階級鬥爭，而以購買股票與設法勞工銀行為獲取生產工具與增加經濟勢力的方法，在美國且已日趨普遍而有顯著的效果，勞動階級既然能夠利用此種手段以逐漸的獲得工業管理權，那末勞資兩方的利益，必漸趨於一致，而階級鬥爭也必為階級合作所代替了。

無產階級獨裁 他的當前任務，是在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他的最後目的是在消滅階級，實現無階級和無國家的共產社會。據共產黨人說，無產階級獨裁的觀念，是區別真實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一切改良主義的重要點。從無產階級解放之實踐的見地說來，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這個理論，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後所體認到的，馬克思在「法蘭西的內亂」批評稱爲最初的勞動者國家之巴黎公社說：「勞動階級不能單純地取了現在的國家機關，爲了自身的目的而加以運用。」又在「哥達綱領批判」上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間，廣

着由這一社會到他一社會之革命的轉化時代，這又是和一個政治的過渡期相對應着，只有這一個過渡期的國家才是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獨裁。根據這一理論，在蘇聯革命初年，便殺戮和放逐資本家地主之事，在中國亦便有所謂「赤禍」歷史。依據我的意見，社會革命如果是歷史產物而不是人工泡製，則無產階級專政，實無必要，十九世紀時，歐洲民主革命運動，已經成爲潮流，許多君主專制國家，改變爲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在國體政體改變之時，並不聞有殺戮或放逐王室，貴族，及一切特殊階級之事，亦不曾剝奪其選舉權被選舉權。國體政體，竟然改革成功，卽其明證。

總之，馬克思各種理論，都有理由，都沒有充足理由，都是一偏之見。

二、列寧主義

史太林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史太林這個意見，主要是在表明「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牠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源，而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其次便是說，「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其實要說列寧主義國際的現象，到不如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一來得安，二來列寧主義就能適用於俄國，而不能適用於國際，各國共產黨，奉行列寧主義的，頗爲不少，沒有一國，能獨革命成功，卽其明證。要說列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鬥

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到不如說列寧主義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但是方法不同，而且本質上有所差異。

據史太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所說，列寧主義包含了三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民族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農民問題，列寧和馬克思有顯著的不同的見解，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以外各階級級別都是反動的，他在路易伯納特之二月十八日一書中，曾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各階級列舉出來，他說：「……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是得到勝利了，在這下面，站着金融貴族與資本家，中產階級，小商人，軍隊，組成自衛軍的貧民，學者，僧侶，及農民。」又在同書，認為法國七月革命的時候，路易伯納特之所以能夠執政，是由於「農民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根據唯物史觀的觀點，認為農民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他的經濟是小資產階級經濟，在本質上，他是徹底地反無產階級的。第二國際的人們對於農民問題，採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即由於此。列寧生活在俄國。俄國的社會，據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寫的一無產階級專政一書所說：「一直到現在，俄國底經濟基礎是農業，而且正是小農的生產，他們佔全體人口五分之四，或竟至六分之五。」據史太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所說，當時（俄國十一月革命時候）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的殘餘，更加上地主的專權。沙皇政府不但不能解救農民這種痛苦，而且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牠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底壓迫，在這種特殊環境之下，列寧喊出了：「農民是無產階

級的同盟者」的口號，承認了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的共產黨人，遂在這種「農聯盟」之下，獲得政權。然在列寧在世之時，已因農民之反對軍事共產，被迫後退，於一九二二年，陸續頒發關於土地的法令，對於耕種所獲，祇收最輕的「單一現物稅」，其餘產物，都歸農民自由處分，又頒土地自耕法，規定農民以自力耕種的土地的面積，許其占有，並承認其永久使用權，土地的買賣，雖然嚴禁，但於一定條件之下，仍許租借，至於雇傭勞農，雖然仍被禁止，而爲補助耕作，雇傭勞動，却不在此限。至斯大林當政，又於一九二五年四月頒布法令，恢復農園的工銀制度，使農民得以工錢雇傭勞動。俄國的政治革命是成功，而社會革命是失敗了。

民族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曾經表示過這麼一點意見：「共產主義者欲謀廢止祖國與國民性，這是非難我們的話，勞動者沒有祖國，我們不能夠從他們取去他們所沒有的一切東西。」這一句話引起了許多人的誤會與非難。到了列寧，把馬克思「勞動者無祖國」這一句話，給了一個限制。依據列寧意見，共產主義者，並不是一般地反對保衛祖國，祇是要根據每一戰爭的具體歷史的特質而決定，如果那戰爭的具體歷史的特質是一種反動的，侵略的及分割殖民地而起的戰爭，無產階級便應當反對保衛他們的祖國，以免爲資產階級所利用，假使這戰爭的特質是革命的，進步的以及弱小民族爲抵抗侵略而起的自衛戰爭，無產階級應當爲保衛他的祖國而犧牲了。據史太林在列寧主義問題所說：「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成波蘭人底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

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這樣看來，列寧對於勞動者無祖國的解釋，是不違背馬克思的原意的。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一切意見，在最高原則上，是和馬克思相同的。所不同的，是馬克思不會將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密切聯繫起來，列寧則認爲「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一部份。」因此原因，不但在理論上主張民族自決，民族底獨立國家的存在權，民族底分立權，和民族自由結合，而且以實際行動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

再有一點，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理論，是與他的一個國家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緊緊相聯絡的，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通過他所起草的共產國際二十一條，其第六條規定，「凡加入第三國際的黨，應明目張胆的反對愛國主義並破壞社會和平主義的虛偽。」第十四條又規定，「凡加入第三國際的黨，應就方之所能及，扶助蘇聯，去制止一切反革命勢力。」依照這個規定，第三國際顯然是富有戰鬥性質，遵行馬氏工人無祖國的這訓了。實際情形，卻又不然，作爲第三國際後台的蘇聯，從一九一九年德國革命失敗以後，就已乘風轉舵，在「國社會主義的新方針下，對外採取睦鄰政策，取得和平，以進行其國內經濟建設，越到後來，越爲明顯。他們自說：「爲「國社會主義」建設而鬥

爭，在本質上，便是國際鬥爭。」誰也知道是自欺欺人，而列寧竟敢制以馬克思二人無祖國的一半意義和共產國際第六條第十四條規定，唱出什麼「工人無祖國」這種荒謬理論，真是令人發噁。

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生前即有此種主張，可是並沒有指出什麼具體方案。據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一書所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根據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種狀態，這個狀態是從純粹的民主制中必然產生出來的。如若無產階級佔大多數的話。」這一段話，曾被列寧認爲：「幸而考茨基著書立說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們底筆端發笑的國家，不然考茨基真會被人笑死。」考茨基那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確有抹煞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性的地方，然有一點，是深符於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認爲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無產階級佔多數佔優勢的國家，不是這種國家，社會革命，斷然不會成功，因此，從馬克思觀點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縱然是採用暴力，也是多數統治少數，不啻於民主精神的。這種專政的內容，到了俄國，就不適用了，因爲俄國在革命時候，卻是農比佔着大多數，而無產階級祇佔少數。所以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又與馬克思有所不同。

專政的政權，據列寧在一九〇六年寫的立憲民主黨人底勝利和工黨底任務說：「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政權，和任何的法律，不承認任何人所定的任何規範，不受限制的，超出法律之外的，依靠實力的政權，——這就是專政。」這個實力所依靠的到底是什麼呢？牠依靠民衆，這就是這個新政權和過去一切舊政權機關之基本的區別，一爲少數人統治民

衆，統治工農羣衆的政治機關，一爲民衆即工農羣衆，統治少數人，統治一小部份警察武裝。這道着，統治一小部份特權的貴族與官僚的政權機關。」因此，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一書便說：「據蘇維埃的憲法，農民佔有參加立法與管理之權的人民底大多數，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是徹底施行的，如若一般說來一個階級是能夠直接實現專政的（實際上只有政黨可以實現），那末這不過是農民專政吧。」關於這個貴難，列寧主義者後日解釋，工農專政，是工人領導農人。然其本質，無論如何，是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了。

無產階級專政底著顯特點，據列寧的意見，有下列三點：第一，利用無階級政權，以鎮壓剝削的資產階級。第二，利用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對於這些羣衆的聯合，和對他們實行國家的領導。第三，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專政的國家形式，則是蘇維埃政權，即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政權，是以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爲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的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的選舉區。使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的結論說：「列寧從馬克思主義言論出發，根據對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研究，得出了結論說：恩格斯馬克思的公式已經不適合新的歷史境況，說：社會主義

義革命完全能夠在一個個別的國家內得到勝利。——其實列寧之否認恩格斯馬克思之舊的公式，何止於此，列寧主義不但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許多地方，是推翻了馬克思主義。

三、史太林主義

史太林在列寧死後，是被托洛斯基所諷為共產國際靈魂。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要改變中共十年來在中國所表演的行動，國際命令，正式到達以後，中共的一部份人，頗覺難以爲情。太子派陳紹禹，王明爲着表示效忠共產國際，曾經這般歌頌他們共產國際領袖的偉大道：「最後，中共新政治勝利之所以有保證，還因爲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和幫助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這個國際的舵師，是偉大史太林久經考驗的戰友，全世界反法西斯帝反戰鬥爭的旗幟，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精華，我們的季米拉洛夫，這個國際的領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專業的忠實繼承者，世界革命的天才的理論家和戰略家，全世界勞動人類的導師和首領，全世界共產主義勝利的旗幟！我們的史太林。」

史太林在中共中，一向是視爲現在的共產國際偉大領袖，極的理論，因爲環境關係，在德蘇戰爭前後，竟畫分了一道分水嶺，在德蘇戰爭以前，可說是舊史太林主義，在德蘇戰爭以後，可說是新史太林主義，新史太林主義當然由史太林主義演進而來，在蘇戰爭却成了權生劑。

舊史太林主義最重要的，第一是一個國家以內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個國家以

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列寧在時，即已發出這種言論，因為世界革命，遙遙無期，如果固執馬恩說，認為一國社會主義為不可能，蘇維埃的政權，是無法鞏固的。因之他說：「經濟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絕對的定律，所以社會主義在幾個或單獨一個國家裏，得到勝利，本來是可能的。」又說：「我知道一般自信為聰明並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學者們，主張我們不要負政府的責任，除非等到各國革命，都告成功，他們不知道自己所說的話，是否認革命，而與資產階級相提携，要等待勞工階級來做大規模革命，就等於叫我們坐下來期待，不要動彈。」但是這個理論的發端雖自列寧，而其完成，則為史太林，他一方面根除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認為「在帝國主義發展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均衡發展之規律的行動，說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線，一般的減弱，與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一方面又根據俄國革命的歷史，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線子在他的最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資本戰線的線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些，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爆發。最後他又置俄國革命的本質於不顧，認為俄國蘇維埃政權的能夠存在至今，便是一國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實證，至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方略，則真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技巧之能事了。既利用共產國際，為蘇聯捧場，又視善帝國主義避免軍事衝突。設立強大紅軍，以勸他國進攻。努力國營工業，發展集體農場，清除反對黨派，加強國家政權。以強化經濟政治，勵行共產教育，提倡民族文化，培植愛國思想，注重軍事訓練，以保障民族國家，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史太林之能戰勝托洛斯基，爲俄國人民所擁護，是在於實行一國社會主義，而其爲中國共產黨所崇拜，則在於其世界革命新理論之執行。史太林認爲在一國內，獲得革命勝利，如目下的俄羅斯，並不祇是帝國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及其逐漸崩潰的產物，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的開端與前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其他各國工農羣衆的幫助愈實際，則世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就愈快而愈徹底。同時他又認爲馬克思、恩格斯過去以爲社會革命，首先開始於比較發展的先進國家，現在這種觀念，必須要根本改變一下。帝國主義戰線底鍊子照例應該在比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占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因此，他便採取了西守東進的策略，選定了中國，作爲他導演革命之場。至於對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徒，他是怎樣說呢？他說，現在是革命潮流低落與沉靜的時候，但是革命潮流高漲，將來一定是要來的。因爲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能鞏固或延長的，所以西方各國的共產黨要磨礪以須。對他本國的共產黨員呢？他說：「俄國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而鬥爭，爲建設而鬥爭，在本質上，便是國際鬥爭，因爲我們的國家，是國際革命的基礎，是革命發展的原動力，我們如果能使俄國進展得很滿意，這就是我們已經按本黨的需要去國際運動各方面，盡了我們的職務。」

一過去有人說史太林放棄世界革命，從這一次世界大戰發展情形看來，中日戰爭起，蘇聯對中國援助頗力，等到戰爭進入中途，便和日本拉手。歐洲方面，原先是以蘇聯反法西斯爲最起勁，等到英法和德國軍事衝突一觸即發之際，反而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以促成

戰爭爆發，自己置身局外，種種措施，出人意表，顯然是寓有深意的，不過自德蘇戰爭一起，而史太林世界革命的一切企圖，都落空了。

德蘇戰爭以前，蘇聯行的是不是社會主義，這是爭論不清的一個問題。然無論如何，蘇聯的建設，是有相當的成績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固守東進，在中國製造革命，玩弄革命，都苦了中國人。

新史太林主義，有下列三項要點，一是國家主義代替國際主義。在俄國布爾雪維克秉政之初，許多寫歷史的人，如波克羅夫司基與布克哈林等人，都有意的無意的忙着輕視或嘲弄一切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與一切俄國皇帝的情形，攻擊國家思想的傳授與民族英雄的崇拜。不遺餘力。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在德國登台，以反共相標榜，一九三四年五月，蘇聯政府即由史太林署名，宣佈對於蘇聯各校歷史教學不滿，不過當時還沒有具體指示。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斯太林乃規定學校歷史教科書的性質，他認為蘇維埃與勞動階級的獨裁，應是整個蘇俄史的發展的合理的結果，舊有的歷史教本，描寫成犯罪和暴動的性質，太不合理。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下令說：「我們光榮的祖國歷史知識，蘇維埃愛國主義和愛國的熱情，都是聯繫在一起而不可分離的。」自此以後，開拓莫司考凡公國的伊凡科里他，從韃靼羈絆下謀解放的第一次俄皇伊凡第三，使國力強盛的伊凡特利波，脫離莫司考凡公國而建立帝國的彼得第一，都被認為蘇維埃的先賢，俄皇主義的征服及其英雄事業，咸為蘇維埃可貴的愛國主義的源泉。又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共產國際世界代表大會，即有根據每個國家

的具體情形和特點，不干涉各國共產黨之內部組織的決議，以上這些，可說是新史太林主義的萌芽。

一九四一年俄德戰爭發生，史太林會議室內，帝俄時代的名將，如蘇伏洛夫，庫圖索夫，納扶斯基等照片，代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照片，成立了二十四年的共產國際，也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動取消，以求得英美諒解，爭取更多援助，甚至馬克思逝世六十一週年紀念，（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在美國的共產黨黨報，尚以很大的篇幅登載，而在蘇聯的報紙，卻一字不提的過去，蘇聯的國家主義可說是達到成熟期了。

二是國家資本主義代替了社會主義，過去蘇聯學校，報紙，講壇與無線電，經常講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教條，認為在商品價格中，超過生產此項商品所費的勞動價值以上的任何華物，如同地租，利息與利潤等，均為罪惡的資本家剝削勞工，勒索勞工得來，最近蘇聯具有領導地位的經濟學家，如里昂梯夫，米丁費道塞也夫，克羅次可夫，法斐洛夫。俄貝里，波頓金，托爾欽諾夫及庫爾涅夫諸人，合同發表意見於蘇聯經濟雜誌，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理論，在全部的修正，資本主義已被稱為一個進步的而非落後的制度，資本累積，利潤經營，工資差異，市場價格與租稅等，都被視為合理，甚至承認在蘇聯亦有經濟定律的作用。一般人士公開的說，這個新學說，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學說，不如說是史達林的學說。這有兩層目的，一在禁止過去攻擊資本主義的咒咀，這會造成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磨擦。二在設法使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能適應與其似相矛盾的實際經濟措施。這

種措施原是在蘇聯經濟發展過程中經過不斷的試驗與錯誤而產生的。

最使各國人士迷惑不解的是：當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勞工的流行思想，已同按照「需要」支付工資的社會主義原則轉變之時，而「社會主義祖國」卻反轉向以生產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支付工資原則了。在美國戰時勞工局和其他官方機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已不願接受「激發工作性」的或按「生產結果」支付工資的制度，大部份的美國工會也繼續在反對計件工資，因此在美國凡同一行業或同一大類別的一切工人，不同工作品質，必須付以同一工資的原則，已逐漸為人主張及採納應用，而這蘇維埃的新學說，卻反明顯的承認激發工作性的工資與計件工資制度，並宣稱其他工資之差別，實基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的勞力在品質上不一致的考慮而行的。

所以，在若干重要生產施和技術上，現在的蘇聯，甚至比美國更資本主義化，但因類資本與主要生產工具仍為國家所有，並仍由國家經營，其制度自然不是美國那種的私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

三是宗教信仰之復活。馬克思主義者根據其辯證唯物論的觀點，認為人類社會對於自然和社會關係之束手和無能，被剝削者羣在跟剝削者羣的鬥爭中之束手和無能，——這便是產生宗教和維持宗教的原因。因此，他們便說，原始基督教主要地是崩潰中的奴隸經濟底宗教，是古代奴隸社會下層大眾消沉，頹喪，悲痛，和失望底意識形態。基督教徒的宣傳自由，乃是把他們各自的希望寄託於天界，對於地上的人間世，絲毫不敢加以觸犯。相反的，他

倒反指示那些奴隸大衆、叫他們乖乖地任人宰割，未來的幸福就完全維繫在目前的前途上。佛教底原始形態，是紀元前四、五世紀時代印度封建社會崩解和商業資本壟斷的表現。佛教徒之反社會鬥爭，主張大慈大悲，逆來順受，也是無力與剝削者鬥爭的勞動大衆情緒之反應。回教是六世紀時阿拉伯所發生的那些社會經濟變革之思想上的表現，商業資本底聯合傾向，乃以新宗教爲其思想的表現。商業資本克服和奴役了貝都英人，同時也克服和奴役了鄰近諸種族，所以回教徒每以高級商人所具的諸特徵作爲阿拉（上帝）底特徵，他們說：「上帝從他底信徒們那裏購買了他們底生命和財產，而償付他們以純靈的安慰。一所以回教也與其他一切宗教一樣，也是維護剝削制度和頌揚舊制度與舊生活的。可蘭經教訓人道：「別死你底眼光注視到一部分俗人們所享受的物質幸福上去吧！應當注視你底遠大的前程。」

因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宗教，一向是採這樣態度，所以俄國在布爾雪維克黨人執政以後，便予宗教以無情的打擊。陸軍甫著莫斯科觀感錄，說俄國流行一種反宗教撲克牌，將牌上所有的人物，繪成僧侶道姑之類，而在人物後面，繪着極小，極有趣，簡直近於諷刺的圖畫來影射前面人物的真面目。K的牌上繪着主教，在他後面是裸體女人，金錢、權威和兇殘的假面具。D的牌上是十分美麗而端莊的道姑，後面是一對裸體接吻的男女。……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裏面，雖然承認宗教宣傳與反宗教宣傳爲人民的自由，規定教會必須與國家及學校分離，對於宗教問題，似採超然態度，而在事實上，則對宗教團體加以種種限制，故事實上蘇俄仍爲反對宗教信仰之國。這一次德蘇戰爭發生，德方之三項宣傳，第三項謂：

「蘇俄人民願從暴力下獲得解放。」信仰之不自由，即爲其攻擊目標之一，美國人士，在德蘇戰爭初起之時，亦因此事，對蘇不甚諒解。然在蘇聯所有之各宗教代表人士，不但不爲德方宣傳所動，而且一致痛斥納粹的土匪行爲和野蠻態度，蘇聯之農村婦女，且經常至教堂爲國家祈禱，宗教信仰，顯然是無害於社會主義進行，而有利於蘇聯祖國，反宗教運動，從此就不再見於蘇聯社會了。

伏爾泰說：「爲了要利用上帝，就是沒有，也得創造一個。」述了馬，列，史三氏說以後，對於共產主義，我真有如此感想。

中共之革命理論（下）

中共是第三國際一個支部，俄共是第三國際一個後台，要知道中共的革命理論，一定要先知道俄共對中國革命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中共的陰謀失敗，幹部派說是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所致，陳氏認為是史太林躲避自己的錯誤責任，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告全黨同志書上說：「機會主義的來源於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的，幼稚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權力。」這是很確實的。

俄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改行新經濟政策之時，就分裂為「列寧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之兩派，一九二二年秋間列寧抱病回鄉，蘇維埃政府有一時陷於羸龍無首之象，於是俄共中央委員會祕書長史達林與齊諾維夫客美諾夫等相結納，在政府中組織一強有力之幹部派，以排擠托洛斯基之一派，結果，因史太林一派藉「列寧主義」信徒之頭銜，較得黨人及人民之贊助，而托氏不能不隱退，史達林遂代列寧而操縱蘇維埃政府之大權，自是以後，俄共之幹部派與托洛斯基派傾軋日益劇烈，無論是俄國國內問題，或中國革命問題，每一種估計，每一種政策，均有相反的主見，這種鬥爭的影響，旋即波及於中國，形成中國的幹部派與托洛斯基派，茲將兩派的革命理論述之於後。

四、幹部派的理論

幹部派的中國革命理論，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所指示的「決定中國革命性質主要因素」

內容如下：（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財政和經濟。（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之壓迫而更加深重。（三）無數百萬農羣衆反對建官僚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長。（四）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它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勢力，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底革命積極性日益增長，它在廣大勞苦羣衆中間的威信日益增長。（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相鄰近。根據這種指示，中國的幹部派遂以現階段中國社會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爲資產性的民權革命。

據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說：「……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個錯誤見解的結果，或者是走到老民粹派的理論，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故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是走到無政府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加一切資產階級革命。」又說：「凡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願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據共產黨國際執委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的特別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大爲依據。」「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化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十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理論根據。

列寧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理論是政黨奪取政權的一種手段，共產黨之參加國民革命，當然是有他自己底目的存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關於共產主義者在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任務決議案一中，曾經這樣指出：「殖民地的共產主義者有二方面的責任：一方面力謀對於民族革命中諸問題作更澈底的解決，即直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另一方面，組織工人農民，為其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而奮鬥，並利用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之間的相互衝突而自取其利。」這是中共參加國民革命企圖的最好說明。也就是中共參加國民革命而又中道離畔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說：「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中共亟欲奪取黨權政權，中共中央的宣傳部長彭述之，寫了一篇「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的文章，發表在中共中央的理論機關雜誌上面，他在列舉各階級不能領導國民革命的理由以後，斷言只有工人階級才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這就是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配掌握中國政權。

南京清黨，武漢分共以後，企圖篡奪黨權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一敗塗地，彭述之被瞿秋白李立三排除了，一九二九年且與陳獨秀一起被開除了黨籍，但是他的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的理论，在中共黨內始終是被認為不能修改的原則。在一九二八年的中共的第六次

大會上，且慎重其事的說：「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但是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甚至中共中央在逃竄到太古式的陝北以後，還在那裏唱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高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就是如此。

現在讓我來檢討幹部派的高見，幹部派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我認爲這是一個不通之詞。馬克思根據他的唯物史觀，對於歷史發展的階段的分析，認爲社會的演進，是由原始共產社會而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社會，以至進展而爲將來的共產社會，這是以摩爾根之人類學說和歐洲歷史爲證明的。現在在研究社會組織之領域內，批評式人類學已將摩爾根與其門人之觀點推翻，認爲各民族之發展，殊缺乏一致性之證據。不同與類同，均可作爲原則。又對歐洲中古經濟之觀察，五十年前與現在，亦有絕大之不同，一代以前，大率以中古時期有兩大特色，一爲自五〇〇至一五〇〇物質文化狀態之一致性，一爲兩大制度即「采地與行會支配之工業」之普遍流行，而今則均知其非事實，馬克思之歷史發展階段之分析，是以歐洲歷史而且是以一代以前一般人之觀察爲根據的，可見馬克思之唯物史觀，基礎已經動搖，把中國社會發展看作和歐洲社會發展一樣，更是解釋不通。至於中共所謂，「半殖民地社會」，則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觀點上也說不通，可說是不通又不通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時就被廢除，門閥階級在五代時也被消滅，新式工業，在鴉片戰爭後，即漸滋長，怎麼能說是半封建社會，或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所說「封建制度反而佔優勢」的社會呢？

中國革命是中國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革命。他因中國人民是處在滿民族一族專制，帝國主義共同壓迫，和官僚豪紳軍閥洋商諸種宰制之下，所以他是民族革命而又是民權革命民生革命。中共把中國革命叫做資產性的民權革命，是根據他的機械的唯物論的觀點，認為中國革命一定要和英法等國過去革命一樣，既沒有認識中國的特殊環境，又抹煞了中國革命的進步性。

最荒謬的，要算是無產階級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這一理論了。從理論說，中共自認中國社會是封建勢力佔優勢的社會，果如所云，這種生產落後的社會，那能形成無產階級呢？從事實說，據一九二七年蘇兆徵的統計，中國產業工人為數達二百七十五萬，蘇兆徵是中共工人運動重要人物之一，他的統計，大概不會少計吧，中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無產階級只佔全國人口千分之六，工人階級不比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可以用他的資本的力量，統治或領導一個偉大的帝國，工人階級則必須用他階級的力量，才能領導或統治一個國家，他的階級的力量完全是階級的人數上表現出來的，千分之六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除了人力以外，一無所有），不能領導或統治千分之九百九十四的廣大人口，這個道理，幾乎是不用解釋的。再以中國無產階級的質來講，也是低弱得可憐，中國因為經濟和文化的落後，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要比歐洲先進國家至少落後一個世紀，一般無產階級，不但是沒有革命的修養，而且有許多是不識字，不但是沒有領導革命的能力，而且他們自己也沒有這個要求。誰也知道：數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大批的農民，被迫離開農村，擠到都市中來，

在中國要謀一個工廠工人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失去卻很容易，因為破產失業的人太多，工廠太小，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預備軍，這個龐大的產業預備軍的存在，隨時威脅着企業的工人，使他們不能不加倍戰戰兢兢，否則一不小心，資本家就可以把他開除。由於這種原因，使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大大地削弱起來，以致使他不能成爲這個時代的革命的先鋒隊。

反轉來說，正因為中國社會階級分野不清，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很幼稚，所以中國革命，乃是不分種族，不分階級的國民革命。

幹部派還有一個錯誤，就是對世界革命形勢估量的錯誤。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把一九二四年以前認爲是資本主義動搖時期，——即第一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爲穩定時期，——即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以來，則爲動搖的第三期了。第三期便是世界革命的高漲時期，中國革命的潮流隨着世界革命潮流而正在高漲。因此對中國革命的策略，就是冒險的狂暴政策，如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李立三的立三路線，毛澤東的農民革命都是。但其結果，世界資本主義並未動搖，世界革命潮流也未高漲，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十年奮鬥，二萬五千里長途之後，扯上了降旗，放棄土地革命，取消蘇維埃，改編紅軍，俄國共產黨在危急存亡之際，也將辛苦經營的第三國際取消，將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修正。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告同志書，說幹部派的盲動政策，簡直成了剷除工人鬥爭萌芽的劊子手，在更太林，布哈林領導下之中共六次代表大會，所有決議，如「中國革命現在階段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資

現工農民權獨裁制」，「革命運動現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要到來」等等，中共所忠實執行，都是些破產路線。現在看來，都證實了。

五、托洛斯基派的理論

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完全和幹部派相反。幹部派以中國社會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托洛斯基則以中國社會爲資本主義社會。他說：「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孕育了中國工業資本階級，同時一部分地主階級在新式工業刺激之下，也來投資於工廠，在這樣發展形式之下，主要農民區域，完全依賴市場，銀行資本權力之擴大，商業之偉大與日益增長，形成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化。」因此原故，幹部派認中國革命爲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而托洛斯基則認「中國革命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包含有階級革命的發展。」幹部派在中國國民黨清黨分共以前，堅決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不許其退出，托洛斯基則自始即反對此項策略。他說：「共產黨的獨立，是成功的先決條件，亦即是中國工人階級革命唯一重心，史太林布哈林賣掉了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又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足以使無產階級獨立政策，爲不可能。」「如共產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則對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將產生致命傷之結果，而且首先危及中國共產黨自身之完全獨立。」在南京清黨以後，幹部派主張中共繼續與所謂「左派國民黨」合作，托洛斯基則主張加入武漢政府的共產黨員，應該立刻從政府中退出來，開始在民衆中有系統的——口頭的或文字的宣傳蘇維埃的思想於全國。並要在可能

的地方，實行奪取武裝，進到組織工農的革命軍。組織城市鄉村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在一切蘇維埃中，以共產黨的黨團爲領導。在武漢分共以後，幹部派認爲中國革命高潮依然存在，共產黨應直接提出奪取政權的議事日程，組織蘇維埃，由小暴動而大暴動，由零星暴動而總同盟暴動，用殺人放火的手段，爭取共產黨的勝利。托派則認爲中國革命已經失敗，革命高潮已不復存在，應提出民主口號，尤其是國民會議口號，爭取羣衆，團結羣衆，以便在日常鬥爭中，提高羣衆的革命情緒，由經濟鬥爭漸次變爲政治鬥爭，直接進行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抗戰初起，幹部派主張抗日，托派則依然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托洛斯基派的理論，雖和幹部派處處立異，其荒謬卻是一樣。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產業工人數目不到三百萬人，托洛斯基竟把他當作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分明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托洛斯基竟說他包含有階級革命的發展，幹部派在國民黨清黨分共以前，堅決主張中共應加入國民黨，明明是迫於事勢，知道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不藉國民黨革命口號，不能發展，托洛斯基卻不顧客觀環境，主張他組織獨立。南京清黨以後，共產黨應立即自行退出武漢政府，這倒是不錯的，但在退出以後，主張奪取武裝，組織蘇維埃，不是也和八七會議以後的幹部派一樣，不顧時代需要，不顧自己力量，盲動暴力，破壞中國革命嗎？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一切企圖，完全失敗，托洛斯基主張等待時機，不要盲動，這也是正確的，但欲假借民主口號，迫使中國國民黨放棄黨權，以達到中共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的目的，也是癡人說夢而已。中國抗戰，在外交上，應當爭取友邦，孤立日本，托派在這時候，

依然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更是不顧環境，矯異鳴高，不足與議了。

最後，關於中國托洛斯基派的形成，也要在此一提：中國共產黨，首先和托洛斯基發生組織上的關係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區芳，陳逸謀等，因其機關刊物叫「我們的話」，所以稱爲「我們的話」派。陳獨秀在八七會議被排斥以後，卽和彭述之等另有秘密組織，一九二九年八月，正式改爲「無產者社」，方才和「我們的話」派接近起來，陳之加入托派，大概是在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無產者社派，我們的話派，戰鬥社派，十月社派，四派協議委員會之成立是在一九三〇年七月，正式統一則在次年五月，他的理論，完全是依據托洛斯基，和中國的幹部派理論，完全依據於史太林，毫無二致。

在中國托派組織未會形成以前，中共裏面，已有許多人的論調，同於托派，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卽有以劉仁靜爲首的極左派，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爲直接鬥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爲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又堅決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集的擴大會議，還存在着對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之估計的左傾錯誤，錯認中國革命性質爲「不斷革命」，後來共產國際對此會有嚴厲的指摘，認爲這種想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其錯誤與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的錯誤相似，抹煞了中國革命最大的特性。

半殖民地的革命。中共中央當然是誠惶誠恐的無條件的接受這種訓示，立即予以糾正。但是這些都只是思想偶然接近而已。

三四

六、李立三的理論與毛澤東的理論

在中國共產黨人裏面，首先以理論家自命，而且竟敢創出一種和國際路線不甚相同的路線的人，要算是李立三了。李立三的氣魄，從這一點看來，是可以稱讚的。但一按其實際，則又令人失望，原來李立三的理論，竟是一半托洛斯基理論，一半史太林理論，所謂對立物的統一，他自己並沒有什麼理論。

李立三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中說：「現在中國經濟的結構的主要基礎，完全是適合於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和封建制度的定義。農民是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物佔有着，地主得以加於農民剝削，就是利用土地所有權的關係，而採用一種超經濟的榨取，統治與隸屬的關係。就是建築在這種剝削的基礎上。」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完全是和史太林意見一樣。因此也堅決主張土地革命。但其革命策略，則有不同。當一九三〇年馮閻戰爭時候，李立三認為革命高潮已到，決定乘機奪取政權，由他支持的政治局，通過一種政治決議案，即對世界革命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的新估量所決定的一種新路線。第一，他的世界革命形勢觀察，謂革命之發展不均衡，是要失敗的，中國革命之成功，必要掀動世界革命乃可，若無世界革命高潮，即不能保障中國革命，故其革命策略是請求第三國際命令蘇俄出兵滿洲，對日本宣戰，同時並撥使滿蒙獨立，進攻中國北部，造成國際戰爭。第二，他對中國革命形勢觀察

，則謂革命勢力已普遍發展，因此主張成立總動員委員會，取消游擊戰爭，發動總暴動，進取全國各大城市。

史太林向來是主張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國首先勝利為可能，社會革命，應該是在帝國主義戰線底鍊子較薄弱的環節發生。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的百分比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之時，並沒有什麼非常意義的。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根據這種理論，加以靈活運用，便製出了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俄接應的前途是可能的。這一議案。李立三認為沒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形勢，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又把六次大會所說的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解釋為必須在全國首先獲得形勢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顯然是採用了托洛斯基的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國首先獲得勝利為不可能的理論，違反了史太林的旨意，所以立刻遭詢、嚴厲申斥，被召到莫斯科去，在第三國際審判官前自打嘴巴，招承自己是「半托洛斯基主義者」。

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一去不回，理論之外，當然還有原因，第一，他在答復反對者質問之時，竟敢說共產國際不明瞭中國情形，聽從國際命令是一回事，效忠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藐視國際尊嚴。第二，他不知道共產國際是為維護蘇聯利益而產生，而存在，竟敢請共產國際命令蘇聯出兵，叫蘇聯和日本去拚命，實在是有點和蘇聯開玩笑的意味，不管他是有意或無意。

毛澤東最得意的是他的農民革命。他之從事農運，據他的自傳說是在一九二四年冬就開

始了，地點是在他的家鄉——湖南湘潭，他在利用回家養病的機會，發動一個農村組織運動。在僅僅幾個月內，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農民協會。後來因為地主們控告，湖南省長趙恆惕要逮捕他，他就逃到廣東去了。一九二五年，他在廣東，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各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叫「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第一本小冊子中，他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因為當時共產國際認識中國的前途，是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並未指示中共去發展農村階級鬥爭，他的意見，當然是不為中共中央之所容納。一九二六年，他再回到湖南，去幹農運，根據工作經驗，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面採取新路線，一九二七年春初旬，他在武漢，參加各省農民代表會議，建議立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但是這個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仍為黨中央所否決。直到五次大會閉會以後，依據共產國際指示，方才走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立場。這樣看來，土地革命，中共裏面，首先提倡的人，要算是毛澤東，毛澤東之成為今日中共首領，也是收功於他的土地革命，不過從歷史看來，這種事情，在中國，八十年前，太平天國會經過過，在蘇聯，二十年前，十一月革命，也曾行過，並且都比毛澤東行的更為徹底，並不算什麼新奇之事。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最迫切需要的是工業化，要中國工業化，必定先要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毛澤東的土地革命的錯誤，張國燾在脫黨告國人書說得最為明白，他說：「中共政策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為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

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牠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牠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李昂先生在他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中撰一聯道：「共產主義今猶在，毛朱成功黨亦亡。」都是確切不移之論。

毛澤東在抗戰發生以後，自己感覺他所領導的黨，已經「是中國一個很大的政黨」。再不能如從前一樣「以感想代政策」了，於是向黨員們提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口號。他真想學習一點東西。果然，在民國二十九年，他出版了一本似乎偉大而甚荒謬的名著，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

張鐵君說，「新民主主義是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的雜種」；陶百川說：「中共的有識之士，大約因為飽受飛躍和長征的教訓，近年來也明白這些道理，所以收起馬列主義，擁護三民主義，但是近來因為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口號，覺得喊起來有些不自在，於是抄江亢虎在二十年前高叫而沒有人理會而近來又在南京大叫特叫的老調——新民主主義，大談其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並說：『共產黨是有現在綱領與將來綱領，或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兩部份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

葉青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新理論，完全是抄着陳公博十多年前的舊論調，陳公博在「革命評論」上主張工農小市民底聯合，毛澤東則主張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聯合專政，內容完全一樣，這些評論，當然都有所見。據我觀察，新民主主義，在形式上，是一半三民主義一半共產主義，是對立物的統一，在本質上，則是舊史太林主義中國化。毛澤東自己並無什麼創見。

新民主主義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認為：「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區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是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完全是因襲史太林的意見。據史太林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現在的階級基礎，當然和抗戰以前一樣，仍然寄託在農民身上，不過經驗已經告訴了他，農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提出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專政共相國的主張，又因為中共一向是以無產階級政黨自命，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實際上是工農聯合而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所以新民主主義也便以「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的專政為內容。他說，無產階級「由於自己底長成與俄國革命底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或「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這個責任，主要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底肩上了。」

為什麼中國革命，一定要無產階級領導呢？毛澤東根據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和史太林在一九二五年所說的話，劃分世界歷史的時代道：「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與

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底時期早已過去了，這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所以「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起了一個變化。在這以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範疇之內，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一部分，在這以後，……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範疇，而……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一部分了。」

毛澤東這一段話，有下列各種錯誤。第一，他利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以參加革命的階級來說明革命，與以分類，沒有從革命底本身着眼。孫中山先生從前，把世界革命分為三種：一為種族革命或民族革命，二為政治革命或民權革命，三為社會革命或經濟革命，比較以革命的階級來區分革命，好得多了，世界革命，除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二者之外，還有弱小民族的世界革命，和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一舉其功於一役」的三民主義革命，不是毛澤東所說那樣簡單。第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並未過去，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未成熟，這一次世界大戰，迫使蘇聯取消共產國際，修改馬克思經濟學說，承認資本主義的制度為進步制度，即其證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出版之時，德蘇戰爭尚未發生，故有此種錯誤估計。第三，中國革命，自始就是三民主義

的國民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主義不是舶來的，革命不是輸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並不能影響中國革命變質。使他變為什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這種論調，完全是受史太林「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相鄰近」這一句話的啓示，想利用外力，在中國爭奪政權。

其次，關於中國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的內因，新民主主義論也曾論到。他以中國社會為半封建社會，所以它底全體成員，沒有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營寨，而有買辦，有地主與農民，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知識份子與其小資產階級等，買辦是帝國主義的，地主是封建的，為革命底對象，資產階級是「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的，很不可靠，所以這個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責任，就不得不落到無產階級肩上。這種議論，更為荒謬，因為他既認為中國社會是半封建社會，階級分化未明瞭，則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便無從說起，所謂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和妥協性，無產階級長成了和覺悟了，變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更談不到。中國革命五十餘年，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到底有何貢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勝於雄辯，何況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歪論呢？

新民主主義論又根據史太林的中國社會觀和馬克思列寧的兩段革命論，——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革命，和由資本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把中國革命也分為兩個階段。他說：「中國革命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

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此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在於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建立與此相反的東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國體方面，是各階級聯合專政，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在政體方面，是民主集中制，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至鄉民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據該書說，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釋的民權主義之實行。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是節制私有資本，發展國營實業，和平均地權。關於平均地權，他的解釋是「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底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底口號，……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底方針。」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由於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一部分，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底一部分，是它底一個偉大的同盟軍。但是這一部分不是以社會主義文化底資格去參加，而是以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底資格去參加的，由於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底領導，因而現時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底領導。——但他亦說，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新三民主義的文化」。新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

這一段話，錯誤更多。略舉如下：第一，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不一定發生社會主義的革命，從工資的規定看來，現在的美國就比蘇俄爲更社會主義化，美國是不會發生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威爾基在他的四海一家說：「對付共產主義最好的表示，是一個有生氣，勇敢而無畏懼的民主政治——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也就是有見於此。第二，中國革命是「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黨經濟革命之源。」有了三民主義的革命，便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第三，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是階級的民主，變相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國是階級分化不明的社會，應該實行中山先生的全民政治，不需要階級專政，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主張中國將來建設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沒有主張建設一個階級聯合專政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大致與民生主義相同，但他以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爲實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則是厚誣中山先生，中山全集只有照價收稅，照價收買，從無「沒收」一詞。第五，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以民族爲形式，新民主主義爲內容，共產主義思想爲領導的文化。所謂共產主義思想，當然是指馬克思主義思想而言，馬克思主義，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完全是一偏之見，不能實現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當然不能作爲新思想的領導，新民主主義形式是一半三民主義一半共產主義的非驢非馬之物，本質是舊史太林主義的新發揚，不能適用於中國，當然也不能而且不可作爲中國新文化的內容了。第六，所謂新三民主義文化，是由「新三民主義」一詞推演而來，新三民主義乃是毛澤東惡意曲解的三民主義，我在「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之態

度上曾經說及，此地不再提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無疑義的是實際工作最有經驗之人，要說他是理論家的話，非誣則

中共之民族政策

四四

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一手製造而成，他的一切理論，都來自第三國際，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共之民族政策，一定要知道第三國際創造人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和共產主義建立者馬克思對此問題的態度。

甲、馬克思對民族問題之態度

馬克思站在階級的觀點上，以無產階級利益為標準，而不注意民族問題，所以他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工人無祖國」，這顯然是對民族問題，沒有什麼理論，更說不到什麼方法了。十九世紀時，波蘭、愛爾蘭和匈牙利等民族獨立運動，馬克思竭力贊助，因為這些民族，都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壓榨之下，他們起來獨立，可以助長歐洲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促成資本主義國家的崩潰。而捷克與南斯拉夫民族的獨立運動，馬克思則持反對態度，因為捷克和南斯拉夫的獨立運動，在客觀上，正是替沙皇張目，於無產階級有害無利哪。可見馬克思對於民族問題，不是從民族問題本身着想，而是一切以階級利益為前提的。

乙、列寧對民族問題的意見

列寧是一個實際政治家，出生較馬克思晚，親見過民族意識超過階級意識——第二國際解散的事實，知道民族獨立運動，是一道不可遏阻的洪流，因此對於民族問題，特別重視，發表了許多意見。和列寧同時的一個著名無產階級革命者盧森堡，說共產主義者是無民族的

「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在社會革命時代，適成了聯合反革命的口號。列寧譏之爲幼稚病，謂爲不懂實際問題。列寧比盧森堡，確是實際得多了，然因篤信馬克思主義之故，祇承認民族問題是附屬於經濟問題以內的問題，承認民族問題而不承認民族主義。斯大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說：「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相聯絡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這就是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基
本意見。

根據這種原則，列寧對於多民族的國家，提出了「民族自決權」，「民族底分立權」，「民族底獨立的存在權」，「民族的自由結合」種種主張，表面看來，與威爾遜在前次世界大戰時所屢次申說的民族自決權似乎相同，而實際並不相同，據民族問題大綱一書說：「社會主義者對民族自決權的解釋，一切政權，歸各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又據伊利奇說：「在壓迫國家中，對於無產者階的國際主義的訓練，其重心在於堅持被壓迫國家的分離或分立，否則就談不到國際主義。」一反之，小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宣傳的重心，放在我們公式的第二個字上，即放在民族自由結合的口號上面，……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閉關主義，孤立主義，特殊主義，應當從全部的和共同的利害觀點上來着想，主張部分的利益服從全部的利益。」可見列寧主張的民族自決權，與一般的解釋不同，他是附有條件的。列寧所主張之「民族的分立權」，和「民族的自由結合」，以完成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爲

目的，視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和各國環境而定。又在蘇聯的民族政策，在表面上雖是以縱的民族的分立爲形式，而骨子裏仍然以橫的階級意識的聯繫爲內容，所以列寧承認民族分立權，事實上是以分立爲形式而貫以統一的內容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一月，蘇俄人民委員會所發布的「俄羅斯各民族的權利宣言」，雖承認俄羅斯各民族之完全的分立權，及完全的獨立國家形成權，實際上仍然是結合而不是分離，這是研究實際問題所要密切注意的。

丙、中共民族政策之內容

一、階級至上：階級至上，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信條，中共以無產階級政黨自命，而且加入了共產國際，作爲他的一個支部，當然是以階級爲前提，而以民族國家爲無關輕重，民十八年中東路事件發生，中共中央，提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把中國當作帝國主義；要以武力反對中國，保衛蘇聯。九一八事變以後，中華民族爲着民族的生存起見，不惜以巨大之犧牲，以抵抗暴日之侵略，而中國共產黨所執行之策略，客觀上完全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二八日本進攻上海的戰爭中，上海共產黨是要瓦解軍隊，進行總同盟罷工，動搖作戰的陣地與後方，在日本進攻熱河與河北的時候，河北省委是同樣的組織唐山天津產業總罷工，以破壞後方的秩序，同時江西的共產黨，更趁着這個民族存亡的關頭，執行他所謂總攻路線，一直到現在全面抗戰，還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游擊國軍和民軍的行動，遠比抵抗敵寇爲英勇，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全國人士，無不希望英美早日在太平洋發動攻勢，多注意於太平洋戰場，中國共產黨獨

主張英美積極援蘇，多注意於歐洲戰場，表面說是對德重於對日，實際就是援蘇重於援華，在中共的心眼之中，蘇聯遠比中國爲重要哪。

中共黨的建設一書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他的政策行動上最徹底的代表民族的利益。」但是所有這一切不能動搖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質，如果以中共既然要成爲中華民族利益的徹底代表，他本身也要變成民族黨，那便是極端危險的誤解，黨只有已真正成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時候，才能成爲民族革命的領導者與組織者。」這樣自相矛盾的說，如何能騙人呢？陳伯達著評中國之命運說：「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到是說得比較直爽。

二、民族分立：中共之主張民族分立，不自今日始，民國十一年，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曾規定「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內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僑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對於國內各民族有一直承認到各小民族有與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江西突圍以後，竄到陝北，更想鼓動西北民族獨立，以瓦解中國，黃操良著抗戰中之中國民族問題云：「在甘肅寧夏的回人，已經在組織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蘇維埃政府不僅不干涉他們的這種合法的民族向上心，並恰恰相反，深深的鼓勵他們。」民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布邊區政府施政綱領十五條，第十四條云：「幫助蒙回民族，實行民族自決。」有人說，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因爲他們站在共產國際的觀點

，所以不能不爲外蒙古的獨立自主作辯護，爲了辯護此種國際主義的綫線，他們遂以民族自決權爲口實來大肆宣傳，據我看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瓦解中國。使中央政府忙於應付，而他們卻可乘此發展勢力，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中國是被壓迫國家，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應當依照列寧所說，把宣傳的重心，放在「民族自由結合」的口號上面，主張羣利益，服從全部的利益，怎麼說要深深的鼓勵他們建立政府，幫助他們自決，以分散民族間的合戰線呢？

三、挑撥民族感情：中共不但是主張民族分立，鼓勵民族分立而已，還要更進一步，曲解歷史，捏造事實，挑撥民族感情，使各部隊對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及漢族發生惡感。黃操良著抗戰中的中國民族問題一書說，中國歷代的民族政策，不出下列幾點，「1、征服和屠殺。2、要求納貢和剝削。3、挑撥離間以夷制夷。4、移民殖邊消滅土著。5、實行民族隔離和歧視。6、遷徙和奴化。7、麻醉和同化。8、鴉片與欺騙。」又說：「我們不必詳細清算過去遠遠的舊賬，即使總的把過去，甚至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來說吧，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在不誠意的威德二字上來對付其他民族的。他們之所謂威，無非是用軍力來征服其他民族，他們之所謂德，亦無非是用政治來消滅其他民族。」中國歷代，對於弱小民族，向來是採用「未同化者許其自治，已同化者許其平等。」的寬大政策，國民黨執政以來，更是變撤扶持，無所不至，中共卻要這樣信口造謠，可見其用心在挑撥離間了。

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說我中華民族「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卽是相結以

累世的婚姻。二中共御用的文化人陳伯達在評中國之命運中駁道：「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嫁，就使得匈奴民族變成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就使得西藏民族變成漢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娶了日本女子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蔣主席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協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陳伯達舉出了漢代匈奴與漢人的苦戰，隋晉時候五胡的亂華，唐朝漢人和回紇吐蕃沙陀的衝突，五代時漢人與契丹的仇怨，宋代漢人與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爭衡，明代漢人與蒙古滿洲之戰爭，清代太平天國的反滿革命，從而說：「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麼殘酷，那麼無情。」他的用意何在？會讀書的人一定是明白的。

四、消滅民族文化：中共爲着要實現他所夢想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文化，始終存着仇恨心理，認爲他是妨礙國際主義進行的東西。因而根據唯物史觀的觀點，認爲「一定的文化」（作爲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中國歷史，在鴉片戰爭以前，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的階段，因而封建文化也是長期的統治着的中國歷史。」把中國固有文化，加上一個總的罪名，叫做封建文化，中共是以反封建爲號召的，「封建文化」當然要在消滅之列。抗戰以前，中共文化工作人，高唱入雲的新文字運動（中國文字拉丁化），大衆語運動（土語文學），就是用心在根本消滅中國文化，支解中國文化。使中國人民不能讀古書，不能說國語，不知有歷史文化，不知有國家民族。抗戰以後，知道這番目的，

時不能達到，於是改絃易張，又有所謂學術中國化的口號提出，名詞怪漂亮的，實際情形怎樣？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說得十分清楚，「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纔能實現。」「把國際主義底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底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原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民族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內容。

誰也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論和階級鬥爭的主張，與中國固有文化，特別是固有道德，絕不相容，因此中共對於民族固有道德，攻擊不遺餘力，何思敬在「駁×××的法律觀」，反對蔣主席中國之命運的利他，仁愛，天下為公各種思想，說要袒利他，仁愛，天下為公，徹到澈底，便要愛日寇，利於日寇，不抵抗日寇侵略，和日寇共有中國。陳伯達在評中國之命運，說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皇帝和臣宰們駕馭人民的法寶，是同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姪稱孫者之所為。齊燕銘在其「駁×××的文化觀」一文，更具體的說，「所謂固有文化，實質上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以中國封建文化改裝了的法西斯主義。」「爲了中國的命運，爲了民族的前途，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以中國固有文化，偽裝了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文化。」可見中共近來，雖主張民族形式，其欲消滅民族文化之心，並未小減。

消滅民族文化，就是消滅民族的初步。

中共之外交政策

中共從民國九年成立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在這二十四年之中，國際局勢，變化萬端，而中共之外交意見，卻是一貫不變，就是一貫主張聯俄，誰也知道，中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第三國際的後台是蘇聯，中共之主張非聯俄不可，是有他的苦衷的，然而中共斷不肯這樣坦白承認，他之主張聯俄，是另有其理論的，雖然這種理論，也從蘇聯而來，表面看來，也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理論是怎樣呢？史太林在其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上說：「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革命戰線，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又說：「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及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這就是說，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殖民地革命的戰略目標，都是帝國主義，西方資產階級之所以能維持其生命的，是因爲有殖民地——弱小民族，爲其尾閥，他們過剩的商品，既有弱小民族替他們銷售，國內就不會發生經濟恐慌，而使經濟基礎搖動，和社會秩序紊亂，同時他們以過剩的資本，剝削弱小民族，而將其剝削的所得，分潤與無產階級，致使無產階級之中，發生一種貴族式的勞動者，爲資本階級所軟化，而失却階級性和革命性。故東方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實爲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催生劑。又從東方民族革

命的立場看來，東方民族革命之不易成功，是因爲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壓迫弱小民族，而其本國無產階級爲之担任交通運輸，以及一切給養，帝國主義者，就易於出兵，而實行其橫暴手段。故帝國主義國家勞資之衝突，或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相互矛盾，乃爲弱小民族獨立運動的好機會。

以上這些，是純粹的理論的考察，事實上，西方無產階級，究竟是否已經成熟到這個程度，能夠了解東方民族革命對於西方社會革命的關係呢？他們的階級意識，是否能夠超越民族意識呢？我的回答是不能，平時西方無產階級，已經表現對於異國的無產者的休戚，甚爲漠視，這一次世界大戰，更刻露着各國人民效忠祖國，效忠民族，並不遜於前次世界大戰，世界戰爭依然是民族與民族對壘，國家與國家交戰，而不是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聯盟。然而中共對於這種事實，熟若無聞，始終是堅持他以往微蘇聯吾誰與歸的老一套，究竟是缺乏眼睛呢？還是缺乏靈魂？我的回答是缺乏靈魂。不信，請就中共歷來外交言論，加以系統敘述

中共歷來的外交主張，約有下列三項：

一、世界最可靠者蘇聯：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上說：「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抗日的頭兩年中，因爲帝國主義之大戰尚未爆發，還可利用英美等國同日本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大戰爆發之後，這種矛盾雖然沒有

消滅，但是已經縮小，如果利用得不當，英美就會要求中國參加反蘇，中國如果依了他們，那就立刻站在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線方面，什麼民族獨立也就完了。這是德蘇協定，英法與德開戰以後，毛澤東的另外意見。

我們定要追問，爲什麼站在英美戰線？（這是毛澤東所謂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線）不站在蘇聯戰線？（這是毛澤東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民族獨立，就不可能呢？毛澤東解釋如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而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依照中共的一貫說法，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中國革命，既然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麼，中國革命，當然是一站在這方面，構成他的一部分，或者附屬於他，中國外交，當然不成問題的應該是聯俄政策了。

列寧在時，祇說過「西方的無產者與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毛澤東卻把中國革命，認爲是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蘇聯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真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了。列寧有知，一定要歎賞不置。

二、天下無不是的蘇聯。民國十八年，中俄中東路事件發生，張學良被迫應戰，中共中央卻以中國爲帝國主義，提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口號，德國自希特勒執政以後，

標榜反共以爲其重整軍備之烟幕彈，蘇聯在外交上，提出和平陣線以爲對抗，中共便跟着蘇聯，喊出「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斯主義。」口號。抗戰發生之初，德義對於中日戰爭，處於中立地位，蘇聯也還沒有和德義斷絕國交，中共的報紙刊物，便主張中國政府，應當和德義斷絕外交關係。到了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中共馬上轉變口氣，從前認爲英美法蘇是和平陣線，對於英美是特別要好的，這時卻說德國因爲帝國主義，而英美更是老牌的帝國主義，這次英德之戰，是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戰爭，非侵略國與反侵略國之戰，甚至波蘭之抗德，也是帝國主義戰爭，德蘇協定，是蘇聯外交偉大的勝利。蘇聯進兵波蘭，誰也知道和德國進兵波蘭動機一樣，其行爲則較德國更爲聰明而亦更不光明，中共發行的新華日報，卻說波蘭少女，爭以鮮花歡迎蘇軍開入。蘇聯侵芬，英美不表同意，中共即說，英美反蘇，且將攻蘇，警告本國政府，不要參加英美戰線，同時又說，英美要在遠東成立「遠東慕尼黑協定」，出賣中國，鼓動國人對於英美提高警覺性。新華日報對於芬蘭政府，更是不斷痛罵，說他是「反動政府」，「無能的政府」，說芬蘭人民生活如何惡劣，表示蘇聯進兵，是在改善芬蘭人民生活，事實是不是如此呢？

中共的外交言論，上面這些，已經夠離奇了，而其離奇猶不止此。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二日，蘇日簽訂中立協定，中共發表意見，謂蘇日訂了中立條約，「是蘇聯外交政策又一次偉大勝利。」也即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勝利。「中國人民的希望，只要說到外援，便只首先寄託在蘇聯身上的，而蘇聯在這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永遠不會使中

國失望。」至於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也是其中應有之舉。——但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現在蘇聯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僅外蒙有利，即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決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與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以上這些話，是蘇日協定後第四天，中國共產黨發表的意見，見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六日延安新華社電）中共自稱是中國人，對於蘇日訂定中立協定，竟說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勝利，那麼，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了。中國抗戰，在外交上的策略，是爭取與國，孤立敵人，蘇聯在抗戰初期，曾給中國以相當幫助，現在和日本訂了中立協定，中共還說並沒有使中國失望，怎樣才算使中國失望呢？滿洲與外蒙，都是中國領土，蘇日協定，聲明互不侵犯，顯然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而中共卻說是其應有之舉，並說保證外蒙不受侵犯。於中國有利。然則中國作了蘇聯的殖民地，不更有利嗎？

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大舉進攻蘇聯，中國共產黨如同悶雷打昏了鴨子一樣，呆頭呆腦。把他以前叫得震天價響的外交理論全部推翻，立刻改變為（一）反德，（二）聯英美，（三）反日，反德重於反日，老牌帝國主義的英美，在這時候中共口中，又成爲民主國家而非帝國主義了。白雲蒼狗，世事真是變換得快。

三、一切爲着蘇聯：一切爲着蘇聯，這是中共所不能公開承認的，事實卻是一點不差，中東路事件發生，中共中央，提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口號，陳獨秀對此主張，不

表同情，寫一封不公開的信給僑中央，提出「反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口號代之，因之被開除黨籍，留俄的軍人派，則於此時，組織國際紅軍，以劉伯承為指揮官，任俄軍前鋒，進攻張學良。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共並不把他當作帝國主義對頭，民族之侵略行為，反而認為是帝國主義相互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之結果，其最要者，則是他們認為日本此舉是帝國主義者相互間企圖消滅其內部矛盾，洩怒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所以中共黨人對國人說：「對於九一八事變，我們應該叫出保衛蘇聯的口號。」民國二十四年，蘇聯在外交上，提出和平陣線，以抵抗德日之防共旗幟，中共馬上宣傳，中國應該加入和平陣線，為蘇聯外交的策應，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蘇聯協定，中共不但撤消和平陣線的論調，反而說蘇聯是帝國主義，謂「英國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美國援助英國，如果中國接受他們的援助，神聖的民族革命便將停頓。」「援助中國的只有蘇聯，中國不得蘇聯的援助，勝利便無可能。」新華日報社論，且大言其「抗戰變質論」，以中僑政府親英美的外交政策，其實完全是為着蘇聯與德國爭分波蘭，和蘇芬戰爭，英美表示不滿的原故。

到了德蘇戰爭爆發，中國抗日，蘇聯抗日，都希望英美幫助，中共要人周恩來，電在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新華日報發表論文說：「現在全世界都正在或將要走上反法西斯的戰場，而納粹德國正是法西斯的頭子，日意是其幫兇，蘇德戰爭又是世界戰爭的主體，中國抗戰則已經起了牽制世界法西斯幫兇的作用，因此，為着使全世界集中目標，集中力量，打擊法西斯頭子，不僅蘇聯，不僅英國，便連美國也要用極大的力量去作戰。」把中國的抗日抗爭，看

爲牽制法西斯幫兇之無關緊要的戰爭，把援蘇看作遠較援華爲更重要，又在三十年七七抗聯紀念，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亦云：「希特勒如在蘇聯得逞，則中國即將遭到嚴重的危機，……蘇聯的成敗，即是中國的成敗，……因而打倒希特勒，不但是蘇聯人民與各國人民的任務，而且是中國人民的任務。」因此，中共在其所謂「邊區」之內，大呼口號，「保衛蘇聯」。

總觀以上情形，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一貫的主張依蘇，祖蘇，爲蘇，以不變應萬變呢？最近出版的中共黨人陳伯達著評中國之命運說：「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今天依靠這國，明天依靠那國，入主出奴，翻雲覆雨的事。」這話是確實的，中共除掉主張始終仰賴蘇聯以外，確不會主張依靠旁的國家。又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心爲國，是天下共見的。」這話也很確實，不過他所忠心爲國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其他國家罷了。

中共之經濟政策

五八

經濟政策是經濟科學對於實際經濟問題的應用，中共的經濟理論既無科學價值，尤不適合我國國情，故其經濟政策，亦盡與我國經濟現狀相乖違。徒見其荼毒生靈，擾亂社會而已，尤可笑者，中共自訂之經濟政策，自行之經濟措施，與其自倡之經濟理論，亦常背道而馳，互相矛盾，十餘年來其經濟措施，前後矛盾，乖謬百出，而以搜刮民財，欺騙無知民衆供其驅使爲一貫目的；但自抗戰以來，口號和方法均有改變。茲分抗戰以前及抗戰以來兩個時期，敘述如後。

一、抗戰前的經濟政策

所謂抗戰以前的經濟政策，是指中共在蘇區內（蘇維埃運動時期）的政策，在此時期，經濟政策，以土地革命爲主，互十年之久，中國農村經濟，遭其破壞至鉅，全部經濟政策約可分爲土地政策，工業政策，商業政策，農業政策，及財政稅法等項。

甲、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是中共「八七會議」以後行動的唯一目標，他認爲這一革命的完成，工農民主專政的任務，也就完成了一大半，然因客觀上不允許採用這層手段，所以不僅退到延安的毛澤東們，要宣其取消此，就在實行時，也笑話百出，錯誤叢生。總計中共正式頒布的土地解決詳細辦法，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國十九年夏，由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土地法三十條，後來被稱爲「右傾機會主義的主張」，因爲牠規定「豪紳地主及反動

派的家屬，經蘇維埃審查，准其在鄉居住，又無其他方法維持生活的，得酌量分與田地。一
是對地主豪紳讓步，沒有依照階級利益去分配土地。第二次是在同年九月，中華全國蘇維埃
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之土地暫行法十六條，主張禁止一切土地的買賣租佃和抵押制度，
組織集體農場及國有農場，提出「土地國有」的行動口號，後來被指為「左傾機會主義」的
主張，因為中國還沒有組織集體農場和國有農場的工業條件，第三次是在民國二十年全蘇第
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法十四條，自稱為階級路線，允許土地可以買賣，租借，典押，承
認集體農場不能馬上實行，提出了依靠貧農，聯合中農，打擊富農，以雇農為領導的策略。
但在民二十二年六月，又有所謂查田運動之提出，說要澈底清查農村中的階級，根本解決土
地問題，可見階級路線，也是荆棘叢生，行不通了。

查田運動，藉口肅清地主與反動，把許多中農當作地主，給以打擊，榨取利益，增加了
農村的騷動，恐怖，到二十二年十月，又頒佈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允許「因變
更階級成份而應變更土地財產之處置」，對於破產地主之家屬，給予相當土地，以維生活，
匪區內的農村階級鬥爭，永無窮極，而中共土地政策之成績亦可見了。

乙、工業政策：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蘇維埃區域內不容許有私有工業的存在，但是
這個原則，中共實無法遵守，十年之中蘇區以內施行的工業政策，尚有兩個要則：第一：一
蘇維埃對中國資本家的企業及手工業尚保留於舊業主手中，尚不實行國有，但由工廠委員會
職工委員會由工人監督生產。二第二：一竭力促進工業的發展，蘇維埃特別保障供給紅軍的

「蘇維埃政策的實施以來，我們只看到蘇區內原有的幼弱的手工業一天天沒落，蘇維埃不見任何新的工業興起，僅存的些許工業，不過維持紅軍的供給而已。工業對於人民經濟生活的貢獻，橫遭壓抑與破壞。」

丙、商業政策：依照社會主義原則，蘇維埃區域內是絕對禁止商品經濟的存在，可是事實上，中共不能執行這個原則；十年中蘇區始終維持着商品經濟關係，其商業政策有二要原則：第一，「蘇維埃應保證商業自由，不應干涉經常的商品市場關係。」第二，「蘇維埃政府應實行監督對外貿易（對蘇區以外的貿易），以保障蘇維埃區必需商品的供給……」即對內維持商品經濟的存在，對外壟斷貿易，掠取軍用必需品，再從其商業稅則觀之，起稅點甚低而稅率甚高，可見其允許商品經濟之存在，除經濟之目的外，尚有財政目的。

丁、農業政策：中共的農業政策，在盡榨取農民以維持其軍政費用，民國二十年以前，土地收入就是蘇維埃和紅軍的主要稅源；民國二十年以後，蘇區中的富農被吞噬殆盡，而一般自耕農及中農也整個破產，我們試一讀中共暫行稅法及農業累進稅辦法，即可瞭然其對農民重榨之一斑，例如在貧農中農土地稅表中規定：分田人數為一人計有谷子假定為三担，即稅率「三、八」數，應納谷子十一斤半，分田人數為二人，計各有谷子假定為三担，其稅率即已增為「三、九」，應納谷二十三斤半，多則類推，對於富農，分田人數同為一人，每谷同樣為三担，其稅率則增為七，須納四十二斤，所謂土地累進稅就是榨取農民的唯一方法，無怪民窮財盡，瀕於破產。

戊、財政稅法：中共在蘇區內所行的財政政策，表面上聲言一切負擔，概歸富人，如稅法上規定：「消滅一切捐稅制度，和一切橫征暴斂。蘇維埃另定統一的累進稅則，使之轉由資產階級負擔。」「取消一切口頭的書面的奴役及高利貸契約，取消農民及城市貧民對高利貸的各種債務；」但實際上中共加給人民的橫征暴斂，不勝枚舉，中共雖取消了貧民的債務，但代之而興的却是各種各樣的公債，關於前者，我們可以看看偽湘鄂贛省青捐雜稅的名目，除了一般屠宰稅，煙酒等稅外，有所謂反帝大同盟捐，互助會捐，慰勞捐，人口稅，米谷稅，鷄鴨稅，養豬稅，飛機捐等數十種，關於後者，有所謂革命戰爭公債，經濟建設公債，計第一期公債總額為六十萬，第二期總額為六十八萬，第三期總額為三百萬，蘇區沒有大都市，大工商業，多落在農民身上，農民之苦，已可概見。此外還有經常的剝削，如供給紅軍酒肉米，婦女則須供給鞋襪草鞋等，名曰慰勞品，實際仍是強迫榨取。

二、抗戰以來的經濟政策

抗戰之初，中共自請停止蘇維埃運動，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聲言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自應奉行國策，服從政府命令，但實際上，中共自始即陽奉陰違，割據地盤，擴大勢力，而其經濟措施，亦以其政治軍事野心為依歸，一切違反中央法規，破壞中央政策，茲就其金融、財政、工商、農業、土地等措施，分述如下。

甲、金融政策：中共的金融政策，在抗戰開始，還能部分遵守抗戰建國綱領，服從政府命令，但數月而後，即生變化，擅立銀行，擅發鈔票，從事破壞國家金融政策，擾亂金融

市場，考其出此之目的，無非欲搜刮財貨，竊取資源，以貫徹其軍事政治野心而已，數年以來，中共違法設立之銀行及發行鈔票數目驚人，茲將調查所得，列表於後。

抗戰以來中共違法設立銀行發行鈔票狀況表

金融機關	發行鈔票	發行額	流通區域
光華商店	光華商店代用券	五千萬元	陝北隴東晉西北
陝甘寧邊區銀行	陝甘寧邊區銀行票	三千萬元	綏德隴東三邊均設分行
晉西北農民銀行	晉西北農民銀行票	五百萬元	晉西北
晉冀察邊區銀行	晉冀察邊區銀行票	二千萬元	冀南晉察冀邊區
上黨銀行	上黨銀行票	五百萬元	晉東
渤海銀行	渤海銀行票		山東各地
魯西銀行	魯西銀行票		魯西
建設銀行	建設銀行票		豫鄂邊區
	江南貨物代價券		蘇省南部

截至最近，中共所發偽鈔，據聞已達三萬萬四千九百七十一萬元，此種偽鈔之發行機關，名稱銀行，並無基金，純係軍用票之性質，除掉強迫人民行使，搜刮邊區以內民財以外，又用以套取法幣，竊奪邊區以外資源，民三十年二月二日延安偽邊區政府之佈告云：「時局緊張，為鞏固我方金融，防止法幣流出資敵，特訂定辦法如下：一、自公佈日起，邊區停止

使用法幣。二、儲藏法幣者，應向邊區銀行及光華商店兌換邊區代價券……（同年四月十三日）中共又復公佈破壞法幣的統制辦法如下：（一）、特區內各商店所存儲的法幣，一律兌換偽幣，違者除沒收外，並依法治罪。（二）、我方往特區之商人，所帶之法幣，須全數兌換偽幣，違者查出沒收。（三）、由特區來我方之客商，攜帶法幣者須往光華商店兌換代價券，轉購貨物，再回我方。（四）、組織商業連絡檢查隊，專司檢查特區內各商業每日進款若干，倘有法幣者，得依法兌換代價券。……表面上雖曰防止法幣以資敵，實則用偽幣以套取法幣，再用法幣以竊取物資。

乙、財政政策：中共的財政政策，一如其金融政策，巧立名目，搜刮民財，處處違背政府法令，其苛捐雜稅，橫征暴斂，較抗戰前，有過之無不及，關於租稅，約有下列諸種。

1、救國公糧——此為中共的主要稅收，中共的違法超額軍隊，即賴此收入支持，偽政府所屬陝北各縣，民二十九年，徵收九萬石，三十年驟增為二十萬石，民怨沸騰，三十一年，減為十六萬石，三十二年，又增為十八萬石，表面上雖似漸少，實際上依然如故。因於公糧之外，另立他種稅項，並提其稅率，以資彌補也。

2、救國公草——三十二年，為一千六百萬斤。

3、鹽稅——為偽邊區重要稅收之一，年收五百萬元。

4、商業稅——三十年開始徵收，採累進稅率，年徵一百萬元。

5、羊毛稅——二十九年冬開始，白羊每頭毛四兩，黑羊二兩，年徵七十六萬斤，均作

軍用。

6、貨物稅——爲貨物過境稅，稅率不一，隨意增訂，酷似以前蓋金卡，其在蘇北泰縣等處，日徵十餘萬元。

以上僅舉其舉大者而已，其他如烟酒稅、煙土特稅、皮毛稅、畜稅、土地登記稅，房產登記稅、營業稅等等，隨時隨地，任意添增，不勝枚舉。至於捐款，則有抗日捐、地畝捐、慰勞捐、寒衣捐、家畜捐、樹木捐、賣戶捐、保安捐等，或按地畝攤派，或按人口攤派，數額與時期均無一定。

因爲偽邊區政府，組織龐大，機關林立，雖設立了許多苛捐雜稅，仍是供不應求，於是統籌統支辦法的訂定，陝甘寧邊區三十一年度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總的方針上說：一、邊區的財政，採取以統籌統支爲主，自給自足爲輔的原則。在三十一年度，實行初步的統籌統支，逐漸過渡到將來的完全統籌統支。二、實施辦法，關於自給自足的費項說：「伙食費、辦公費，特別費，由各機關、部隊、學校自給一部份；蔬菜、肉食，由各機關、部隊、學校全部自給，餘以下的各級政府，另外自給一個半月的糧食。怎樣自給自籌。一是組織合作社，運銷仇貨，猶其鴉片烟。二是侵佔人民已開好的熟荒，種植雜糧或細糧。三是種植鴉片。第一第二兩個方法，在抗戰初，就已實行，種植鴉片，卻從三十一年開始，因爲沒有栽種經驗，栽在荒地上面，沒有施肥，收穫不多，而種植消息，透出境外，大受輿論斥責，到三十一年，中共中央，對於種植方法，乃不能不加以改良，一面在三十一年春初，佈告人

嚴禁種烟，藉以欺騙邊區以爲本土之產而由偽財政廳之密派幹員，選擇僻地，調遣武裝工人，秘密種植，實行統種統銷。栽種方法進步，運銷方法，也大有進步，對於財政收需，裨補非淺鮮。（據最近延安邊區大報，本年邊區軍隊，每連種鴉片六十畝，皆在僻壤之地。）

丙、工商政策：中共的工商政策，遵守兩個原則，第一是軍需工業，第二是套取物資。而後者亦無非以供給軍需爲目的。近年以來，中共積極提倡手工業，組織生產合作社，均基於此目的。陝甘寧邊區三十一年度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實施辦法第五項，生產自給辦法：「工業，各單位均可經營，交通運輸，各單位均可經營。商業，祇邊區一級各主管機關，專員公署，縣政府以及軍隊中的旅級以上機關，可以統一的經營商業，其餘一概不准。各機關商業，以經營邊區境內商業爲主，對外貿易，則由邊區貿易局統一管理。生產規律，必須遵守分散經營，集中領導的原則，必須不違反政軍與法令，不破壞財政金融制度，不受人民的利益來解決自給任務。」陝甘寧邊區禁止糧食出境修正暫行條例。第三條云：「凡邊區所有糧食，不論屬於原料或製成品（如麵粉），一概嚴禁私運出境。」第五條云：「凡糧食入黨者，一律不受任何限制。」一文觀其非邊區產品在邊區銷售之稅率表，壬布稅百分之三，起徵點爲五〇元，而各種絲毛綢緞織品，稅率百分之二〇，起徵點爲四〇元，均可見其套取軍用物資之用意。

因邊區缺乏資本，僅有的幼稚的煤鐵工業，及毛工業，紡織工業，尙不足以支持軍用

，故近年來，藉用有組織的商業走私，暗中運糧仇貨，竊購後方之棉花棉紗，尤其近兩年來，大量種植鴉片，以鴉片交換必需品，誘致奸商，甚至武裝偷運，目無法紀，凡熟悉其內幕者，無不痛心疾首也。

丁、農業政策：中共農業政策，與其在蘇區時最大不同，即為允許富農存在，並予以鼓勵。民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提出「開展吳滿有運動」，三月十五日，又發表「關於吳滿有的方向」一文，認為吳滿有是邊區公民模範。吳滿有家原有耕地六十畝，三十二年，新開荒地二十五畝，共為八十五畝，耕畜有大牛四頭，馬一匹，驢一頭，勞動力除吳滿有父子和其二弟以外，準備在三十二年內，雇傭長工二名，牧童三名，零工一百五十天。他的經濟，顯然是建立在自已勞動與僱傭勞動的基礎之上，邊區政府為什麼要予以鼓勵，這在邊區徵收救國公糧累進稅率表上，則看得十分清楚，依該表所載，每口平均所得糧額，如為五斗，一五〇斤，徵收公糧百分率為五，如為六斗，一八〇斤，則為百分之六，以此類推，每增一斗，則增百分之二。如某富農，每口平均所得糧額為三十斗，九〇〇斤，則徵收公糧百分率為三〇。邊區政府為徵收九萬石救國公糧致各專員縣長指示信（民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云：「要有軍隊，才有邊區，要有軍糧，才有軍隊。」軍糧何來，當然是取之農民，尤其是富農，邊區政府之獎勵富農，還不得明瞭麼？

邊區政府，雖然允許富農存在，並把富農加上一個勞動英雄的美名，但對地主，仍是限制很嚴，這可於其減租減息規定見之。規定如下：1. 實行三七減租。2. 民國二十八年正月

以前的陳租豁免。如果種田地之收穫量，地主最高限度，只能分得百分之四十，4每月每
元利息不得超過三分，5舊欠利息歸還時，不得超過原本。陝北雨量稀少，土地生產有
限，地主繳收地租，收到收穫量的百分之四十，地租並不為不高，但因地主，每人開收糧食
，超過三百斤以上，要加倍繳收救國公糧，實際所得，仍為有限，加以中共初到陝北之時，
曾經一度土地革命，抗戰以後，又常假託除奸肅反等名，向地主不斷進攻，邊區地主，奔走
則逃，存留是有限的，然無論地主之多或少，中共所宣揚的減租減息，還租還息，如果在另
一方面，能夠發展生產合作，成立農民借貸所，穩定金融，禁止囤積，則其切實執行，對於
貧民，到也不失為惠而不費的一番善政。

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關係

六八

一、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布爾雪維克黨人掌政。

二、民國八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

三、民國九年春，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來華，建立黨的組織，首先找到了陳獨秀，遂於是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當時，首先加入組織的有陳獨秀，戴××，李漢俊，施存統，陳望道，俞秀松，李達，沈玄慮等八人。戴氏旋即退出，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小組織的形成。

四、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上海，到會代表共十三人，代表黨員五十人左右，共產國際派馬麟（荷蘭人）出席。指定陳獨秀為總書記，並承認該黨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自威經斯基來華至此，共產國際共用盧布二十餘萬。同年十一月，美總統哈定，召集華盛頓會議，美、英、中、日、法、意、葡、荷、比九國赴會，而蘇聯不被邀請，共產國際，乃召集遠東大會于莫斯科，以反對華盛頓會議為號召，得代表三十餘人參加，該會議決，命中國共產黨進行民主革命鬥爭，在民主革命中，並得進行農民蘇維埃之組織。

五、民國十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杭州（據毛澤東自傳係十一月各處在華開會，此從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到會代表二十人，代表黨員約百人以上。

大會決定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參加民族運動，並在國內，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共產國際觀察員審可斯基來華，批評中共的工作爲敷衍而不切實際，口說而不能實行。蘇俄代表越飛來華，與孫中山先生磋商中國國民黨容共問題。中國共產黨派代表赴俄，抵俄以後，俄人對之極力稱讚三民主義，勸其悉心研究。

六、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特別決議指出：「國民黨是中國現時唯一強大民族革命組織……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尙未充分化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同月二十六日，越飛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發表孫越聯合宣言，在宣言中，越飛承認共產黨組織和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是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到會代表二十八人，代表黨員三百人左右，大會正式確定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之時，張國燾堅決反對加入，與陳獨秀爭執甚厲，後因國際代表提出「中共須服從共產國際之決議」，反對者方無異議。但在大會以後不久，共產國際即再以命令，指示中共，發展自己組織，分散國民黨勢力，中共遵承國際意旨，遂有一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領袖陳獨秀且有分散中國國民黨力量的三項原則之擬訂（三原則見中共之戰略與策略），民國十三年六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曾就中共對國民黨之陰謀，提出彈劾其

匪黨員案。

七〇

七、民國十四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會，黨員數目已發達至九百人左右，雖中觀現代革命運動史一三七頁說：「大會討論了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克服了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左的傾向。一是年六月十三日，國民黨消滅楊希閔劉震寰兩部叛軍，革命聲勢大盛，共產國際乃又移令中共開始籌備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其第一步計畫，即改組汪元勳為委員長，第二步計畫，為分散國民黨勢力，割裂為左右派，第三步計畫，則更進一步來奪取國民黨武力。」

八、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海軍代局長李之龍，受蘇俄東方部監察委員會主席若比亞克之

煽動，率領中山艦隊，直駛黃埔，欲藉黃埔青年軍人聯合會學生為內應，攻佔黃埔，以圖推翻國民政府，奪取政權，幸為蔣校長發覺，先發制止，將中山艦接收，軍士解除武裝，黃埔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方得無事，五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四件，其第三次議案之第七條：「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即為防止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搗亂而設，是年七

月國民黨出師北伐，共產國際又命中共領袖陳獨秀加以阻撓，陳氏因在「嚮導週報」上發表「論北伐」一文，非難北伐。俄顧問鮑羅廷又指揮廣東共黨暴動，企圖奪取廣州兵工廠，以絕北伐槍械，並鼓動工潮，收編土匪爲工農軍以搗亂後方，幸爲國民政府所搗破而加防止。

國民革命軍北伐以發，進展神速，是年年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全會，對於中國革命，乃有下列六項之決議，指示中共：（一）土地革命不要政府下令，而先領導自發之沒收土地運動。（二）在國民黨中央，增加新領袖代替老領袖。（三）改造國民黨組織。（四）消滅國民黨中之忠實將領。（五）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份子。（六）工農軍的土地不沒收，中共後來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辯護說：「如果當時第三國際真的有這樣主張，也不過是完全爲着革命的利益，爲着革命的需要，爲着國民黨的鞏固與發展……並非所謂陰謀。」可見上項決議，是確實有的。然在此時，共產國際，雖不斷指示中共搗亂國民黨，而於中共之欲退出中國國民黨，則竭力制止。陳獨秀在民十三年十二月的告全黨同志書說：「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事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爲黨外聯盟，否則其勢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羣衆的信仰。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意見……一面派遠東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共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即其明證。

九、民國十六年四月至五月，國民黨在南京清黨，至四月廿九日，中共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據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說：「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國際執委第四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會完全和一致接受了這一提綱。大會議事日程上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大會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却並未給以明確的徹底的解決。後來不久，根據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修改了這一個決議。更加徹底的走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立場。『可見中共的實行土地革命，是完全出於國際意旨。』七月，共產國際代表魯意，以共產國際執委第四次全會決議六項（見前）出示於汪精衛，國民黨武漢方面，因而分共。

武漢分共，共黨陰謀，完全失敗，共產國際命其代表羅民那種召集中共中央全體及地方代表緊急會議，諉革命失敗之罪於陳獨秀，遂在一八七一緊急會議之中，利用翟秋白等，罷免陳之總書記。僞十一月擴大會議，更明確的確定了土地問題與策略，提出了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但據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說：「擴大會議還存在着對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之估計的『左』傾錯誤，錯認中國革命性質為『不斷革命』，後來國際對此會有嚴正的指摘，認為這種思想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其錯誤與託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錯誤相類似。』十二月，廣州暴動，暴動日期，原定於十二月十五日，因被當局查悉，風聲特緊，經張太雷，葉挺，黃平等在東山俄領事連夜會議之結果，遂提早於十二月十一日暴動。

十、民國十七年，中共暴動，糜爛失敗，共產國際譴罪於中共代總書記瞿秋白，認定瞿秋白「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並命令中共從事「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是年六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會，秉承國際意旨，規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一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清算左的盲動主義，瞿秋白因之下台，由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總書記，美其名曰「提拔工人幹部」，實則企圖控制便利而已。又因中共內都衝突日烈，遂將各派領袖，余飛，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關向英等留為駐俄代表，而命向忠發，項英，李立三等回國主持中共。

是年七月，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對於中國革命有所檢討和指示，大會在「告中國工農書」說：「廣州起義（即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動羣衆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極廣泛的工農羣衆起義，組織在列寧主義的激騰堅決的策路之下；得着國際無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爲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

十一、據「文件彙編」第二冊第四二〇頁說，向忠發既當了中共的總書記，自俄回滬，「不僅政治上不能掌握，即通告文件也看不懂」，結果大權乃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手裏，李氏自民十八年起，掌握黨權，廣佈同志，自成一派，名曰中央幹部派，對於共產國際命令，頗不忠實執行，國際大爲不滿，來信指責，李氏竟謂「第三國際不明瞭中國情形」，反對者或謂「不服從國際指示，寧爲紀律所許可耶？」李更盛氣而謂：「服從第三國際紀律是一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事。」及其軍事計畫，估價

長沙，吉安失敗，以武漢爲中心之全國總暴動未成，共產國際大憤，以李立三玩弄暴動，發送黨徒，蔑視國際爲名，派瞿秋白回上海，于十九年十一月召集「三中全会」，檢查李氏工作，然在是會，瞿秋白與李立三竟相勾結，對抗陳紹禹等留俄學生，形式上雖然接受國際路線，實際上仍爲立三路線之支配，反對的人，首在在此時期瞿的主張，證爲調和路線。共產國際爲圖解決這個糾紛，乃召軍事人才的多數的別首領周恩來赴俄，據云：史太林會親自對周氏指示李聖的錯誤，並令周代表國際召開四中全会，從事反「立三路線」及反「調和路線」的鬥爭，周氏回到上海，於民二十年三月召開四中全会，肅清立三路線，接受國際路線，舉張福垣爲總書記。這四年齡和能力，正與向忠發相類似的老人，也是一個工具，由太子派陳紹禹秦邦憲負其實責，陳紹禹在民十四年還是青年團員而非共產黨員，十八九年前後在黨內做技術工作，這時一躍而爲中共實際的負責人，全出於留俄時的老師老夫之助，共產國際之官僚作風，沒有比這事表現得更明顯了。工會運動首領羅章龍何夢雄等不服，陳遂挾其國際之威，開除羅氏黨籍，而將何夢雄派十餘人，用借刀殺人之法，完全送給國民政府殺掉，自此以後，中共益唯國際之命是從了。

十二、自李立下台之後，陳紹禹在黨中清黨（李立三和其他反對派），毛澤東在軍中清軍，（李立三系軍隊和其他不忠於毛的軍隊），黨已不能完全控制軍隊，民二十一年冬，毛澤東請求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蘇區，陳紹禹本來是不願意的，因爲共產國際在這時

候，祇允許供給很少數的職工運動費給中共，中共中央經費，要仰給於蘇區，毛澤東以停止經費供給相要挾，陳紹禹便不得不聽從了。中央遷到蘇區之初，秦邦憲等拉攏周恩來和劉伯承，還能和毛澤東稍為相抗，民二十二年七八月的反羅明路線，即是給毛派人物的一個打擊。因為毛澤東握有軍權政權，太子派的勢力終於一天天的趨於削弱。民二十三年一月的五中全會，雖然是太子派在黨中仍佔優勢，而在五中全會閉幕以後，接着舉行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之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卻是毛派佔了絕對優勢，偽中央政府第二屆各部委員，太子派祇有張開天一人當選，二十四年一月遵義會議以後，太子派在黨中央的優勢也失去了。

十三、

自民國二十四年到現在，中共的黨軍政三權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毛澤東雖翻開了以國際路線自命的陳紹禹秦邦憲等，對於共產國際，仍不敢不唯命是從。二十四年八月，蘇聯為着感受德日的防共威脅，召集了久不開會的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於莫斯科，因反德反日，在遠東方面，需要和中國聯合，提示中共，要他改變十年以來在中國所表演的行動。中共自己雖然認為「畏葸」，「出口」，「變」了很多的思慮，並且「難過萬分」，（見張浩譯中共的策路路線）但是為着黨命，為着國際命令，為着蘇和國軍壓迫的各種原因，終不能不放下屠刀，這就是所謂放棄土地革命，取銷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改編。抗戰以後，為着假蘇聯以自重，假馬列主義以欺人，假塔斯社以向國外宣傳，更不能不賣好國際，而國際亦不能不籠絡中共，國際深知毛澤東根深蒂

固，不可輕侮，而陳紹禹是頭重脚輕，沒有什麼大用處的。

七六

十四、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爲了維護蘇聯利益，取得英美對蘇聯更大的諒解，更多的援助，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發表了有五月十五日擬定的「關於解散共產國際提議書」，各共產國際支部一齊批准，共產國際在形式上，算是不存在了。中共接到了這個消息以後，五月二十七日在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及幹部緊急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作了四項決定，第三項說：「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凡是那裡有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便會有一天出現工人階級的政黨，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產生，這是歷史的必然定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卻已能夠完全獨立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黨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第四項說：「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是否應運而生？這問題是辯論不清的問題，很久以前，中國共產黨人，是否能夠完全獨立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黨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有事實在，也不用我去討論？現在所重要研究的，是

中共能否「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依據一九二〇年（民國十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二十一條第六條云：「凡加入第三國際的黨，應明目張胆的反對帝國主義並扶破社會和平主義的虛偽。」第十四條云：「凡加入第三國際的黨，應就方之所能及，扶助蘇聯，去制止一切反革命勢力。」共產國際解散之後，中共當然可以不受這種法規束縛，但據我的觀察，中共是不能而且也是不肯放棄這兩種立場，因為中共在四項決定之中，宣稱絕不放棄馬列主義。明瞭馬列主義主義的人，都知共產國際上面兩條規定，就是馬列主義精義之所融化而成，中共既不肯放棄馬列主義，當然仍要遵行上面二條，而這兩條又是和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是不相容的，再就客觀環境看來，共產主義，曲高和寡，蘇聯需要中共為之撐持，而中共也需蘇聯為之聲援的。去秋以來，中共雖不再標榜世界革命，而於階級至上的論調，並未放棄，其行動也是一切以黨的利益為前提，整風運動，對於國際路線，雖為明顯的絲毫保留情面的清算，而於蘇聯仍是敬禮有加，其點唯恐不盡，其言明證。

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之態度

七八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軾廬山真面目

蘇軾廬山真面目

到過延安的人，一定知道，中共裏面，有一套這樣腔調：「同志，你的意見，在主觀上是××××，在客觀上是××××××。」在表面上，中共似乎是很反對主觀主義的，在實際上，中共的認識事物，完全是憑着主觀，沒有一點客觀精神。中共對三民主義之認識，前後種種不同，亦即由於此種主觀作祟。述之於後：

一、一抑一揚

中國辛亥革命時候，列寧正亡命於國外；當他在報紙上看見中國革命消息，曾經寫了幾篇關於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論文，共產黨把他的一部份收集在列寧選集第七卷，關於辛亥革命，該書第四二〇頁說：「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該民族不僅善於因自己長期的奴隸狀況而痛哭，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還善於去向長期壓迫中國的人們作鬥爭。」這話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寄予中國革命以偉大的同情。關於孫中山先生，該書四二一頁說他是一代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真正奮鬥的和澈底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他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底同志。「這是列寧根據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認定當時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因而對於中國革命導師加

上一個不很切合的評語。關於三民主義，該書四二二頁說：「沒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能真正解放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因為，這種高漲激動勞苦羣衆，並使之能夠完成奇特的事業，而孫逸仙的綱領，句句都是表現這種高漲的。」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反對壓迫羣衆及反對剝削羣衆……實際上所得出的綱領却是：只是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同上書四二五——四二六頁又說：「最後，上海底數目既然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也將增長起來，它大概組織某個中國社會民主工黨，這個政黨在批評孫逸仙底小資產階級空想及其反動觀點的時候，大概將把孫逸仙底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抽引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這是因為當時中國，上海底數目還不甚多，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祇有平均地權，而無節制資本和發展國營實業，而列寧在當時革命未成，不曾實際從政，也沒有如後日軍事共產失敗那樣的經驗，所以對於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贊揚辛亥革命即是贊揚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均極稱贊，而於民生主義，則認為「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而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二、服從遵守

民國九年，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許多虛布，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感覺中國社會沒有推行共產主義條件，共產黨的勢力，不易發展，乃命中共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做國民革命工作，民國十二年，中國共產黨重要領袖李大劍，遂在上海首先加入國民黨，在未

加入以前，蘇俄代表越飛，曾與孫總理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承認共產組織和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在加入以後，民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李大釗又在大會席上聲明：

「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

李大釗是中共所諱為「中國歷史上不朽的革命偉人」（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八五頁），他這一個聲明，就是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公共聲明，當然不是說謊。

三、讖語變罵

民十四年，孫總理逝世，國民黨繼承遺志，奠定廣東，中共頗為妬忌，開始以列寧主義批評孫中山主義，認孫中山主義為不徹底，企圖搖動本黨同志信仰，戴季陶先生在這一年，著了許多書籍，內中如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對於三民主義，多所發揮，即為針對中共而發。民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海軍代校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查封黃埔軍官學校以內共黨所組之革命青年軍人聯合會，禁止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機關以內，批評國民黨主義。民十六年，國民黨既佔武漢，進師江浙，革命事業，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共產黨深知三民主義迎合人心，乃改變為一面批評，一面曲解，批評的人，如蕭楚女，惲代英，

將三民主義認爲是唯心派的理論，曲解的人，斷章取義，謂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牽強附會，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爲總理三大政策，而三大政策又爲三民主義革命靈魂，以抬高其自身地位，掩護其暴動行爲。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七月十五日，武漢分共，共產黨員已被遊於國民黨外，史大林還在莫斯科大聲疾呼：「青天白日旗不要叫他人搶去。」但在八七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想要假借國民黨名義，已不可能，所以又變曲解而爲慢罵，羅秋白論三民主義這一本書，就在這時，用中共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名義出版，說「孫中山先生底全部著作，都是雜湊，簡直是一片雜貨店。」一民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彭德懷攻陷長沙，張貼標語：「三民主義，阿彌陀佛，五權憲法，齋肥豆腐。」

四、陽奉陰違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中共傷處陝北，形勢危殆，發表「一致中國國民黨」，主張蘇維埃政府可以取消，爲着團結抗日，可以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西安事變以後，再向國民黨要求，國民黨三中全會，遂有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同時中共中央，亦向國民黨發電，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即爲其四項保證之一。時爲二十六年二月，在此時期，中共的報章雜誌，提出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口號」，蓋必武在民二十六年六月出版的解放雜誌，發表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一文說：「爲什麼我們要提出革命的三民主義呢？因爲三民主義雖是孫中山先生創造出來的，但中山先生的著作關於三民主義的部份，却有許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論點是保守的，是武斷的，如民族主義中之以大漢族

爲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爲民族的基本組織，民權主義中權與能的劃分，民主主義中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社會的病埋學家，并說馬克斯主義的不是其產主義，浦魯東，巴枯寧等所主張的才是真正的高產主義等等，」又說：「什麼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呢？這散見於中山先生的許多著作之中，而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詳盡明顯地規定起來……」宣言上所說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主張原則上相同，所說的民權主義如果真能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馬克思主義者亦當擁護，所說的民生主義如真能實現，在經濟落後的中國，也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前進一大步，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革命方面有進步作用的任何主張，總是贊助的。」又說：「我們共產黨主張這樣幹，這與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三民主義在現階段真正實施起來，沒有什麼不相容地方，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員可以而且應當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的基礎。」原心他們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以三民主義爲軀殼而實以馬克思主義靈魂的一種曲解。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我們看來，和三民主義並無矛盾之點，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對於三民主義，始終是遵行惟謹，沒有一點違背，中共之提出革命的三民主義口號，就是一種陽奉陰違的行爲。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八月十三日，淞滬大城繼起，中共乘着抗戰機會，要求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重行宣告國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但在這個宣言發表以後，不到兩月，毛澤東便在解放週刊上說：「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反對帝國主義，這就

是徹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別的，這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無疑的是徹底的民生主義。原來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願為三民主義徹底的實現而奮鬥」，澈底的三字，竟可是這樣解釋；共產黨人真是聰明萬分；我們祇要追問一點，蘇維埃制度和土地革命，既然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為何在一個宣言之中，既說願為三民主義徹底的實現而奮鬥，又說「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一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未免太不能自圓其說吧。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洛甫發表「共同防共即是滅亡中國」一文，他說：「我們共產黨人認為，如果有人天天喊擁護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而對於漢奸汪精衛之流所宣揚的偽三民主義，不加以嚴正的公開的駁斥，同時對於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瞭解的真正的三民主義，不加以誠意的實際的接受，則真正三民主義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共產黨人，竟以他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瞭解的三民主義為真三民主義，而以其餘的為偽三民主義，顯然是以和中國國民黨爭三民主義正統了，真是異想天開。民國二十九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出版，對於三民主義的曲解，更可說是集其大成。他因發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一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如此。「一語，認為孫總理在「民國十三年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一次，因而肯定的說：『這篇宣言還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以後的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又說：「沒有三大政策（即所謂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或三段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據我看來，三民主義隨着時代演進，這是不能否認的事；但其演進，是自幼少而成長，斷不是由甲變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謂，「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如此。」乃是因為當時三民主義，尚未出版；全國人民，不甚明瞭；故須作一簡單扼要說明，並不是說三民主義有許多解釋；或者如毛澤東所說有新舊兩種不同；以民十三年容共聯俄爲界。至於共產黨人所謂三大政策，在孫總理遺著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之中，根本沒有這個名詞，看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人，誰也知道，國民黨「對內政策」，「對外政策」，不止於三；而所謂聯俄聯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之中，更是一字未提；毛澤東的牽強附會，及其武斷精神，真是令人欷歔。

新民主主義論說：「真理只有一個，三民主義亦只一個；而共黨前後認識，竟是這樣不同，是何道理？」

中共之戰略與策略

社會革命的進行步驟，據河上肇氏的意見，可分為三時期，第一時期，是獲得國民之多數信任其綱領及政策之正確；第二時期，是政權之獲得及壓制掠奪者之反抗；第三時期，是經濟的經營。列寧在敘述俄國革命的經過說：「我們的黨，使俄羅斯信服了。」——這是第一期底事業；「我們替貧窮者，從富豪手中，替受難者，從掠奪者手中，得到了俄羅斯了。」——這是第二期底事業；「而目前我們的事業，是在經營俄羅斯了。」——這是第三期底事業；社會革命的完成，必須經過上三時期，然怎樣才能經過這三時期呢？這就要說到革命進行的方法，戰略與策略的運用了。

一、什麼是戰略

斯太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說：「戰略是爲了決定當該革命階段中無產階級的主要攻擊方向，成就適應的配置計劃各種革命的勢力（最重要與預備軍及比較不重要的預備軍），遂行這個計劃於當該革命時代的整個期間的鬥爭。」又在「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一文說：「政治戰略的任務首先在於：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綱領底結果出發，並注意到各國工人革命鬥爭經驗，正確地決定一定的歷史時期中某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底主要方向。」因此，戰略的中心問題，應該包括下列諸項：（一）當該階段革命的主要目標是什麼？（二）革命的主要勢力是什麼？（三）直接的預備軍是什麼？（四）主要的攻擊方向是在什麼

地方？（五）革命勢力的配置計劃是怎樣的？（六）爲了貫徹這樣的戰略，須有怎樣的指導

斯大林在「到十月革命之路」序文上文說：「列寧主義之根本的戰略的準則是在什麼地方呢？那是在乎下列各點的認識。一、在漸漸迫近的革命的裁決時期中，革命的敵人之最危險的支柱是妥協黨。二、不使這些黨陷於孤立，那便不能消滅了敵人。（沙皇或資產階級）三、所以當準備革命的時期，必須以最大的努力，使這些黨陷於孤立，把廣泛的勞動大眾從這些黨中解放出來。」這個準則，曾經各各應用於俄國的兩個革命階段中，並且被這兩個革命階段的經驗所證實，如在俄共和沙皇相鬥爭時期，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〇五—一九一六年）的準備期間，向立憲民主黨集中了主要攻擊，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向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黨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集中了主要攻擊，即是。

其次關於革命指導問題，戰略指導的中心問題，是在正當的利用預備軍（重要的預備軍及不主要的預備軍），須注意下列各點。（一）在決定的瞬間，集中自己方面的主要勢力於最使敵人感到打擊的場所（間接的預備軍的利用和直接的預備軍的誘導）。（二）選定決定的打擊的時期（在這個場合，須正確的計量間接的預備軍的狀況和直接的預備軍的狀況，要不這樣，便會陷於所謂時期尚早）。（三）不斷地依據根本方針而實行，不是這樣，便不能使大眾知道戰略。（四）在進攻和退守中正確的利用預備軍。

二、什麼是策略

（一九一六年）

策略一詞，也有人把他稱為戰術。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說：「策略是關涉到無產階級鬥爭形式及組織形式，關涉到這些形式底更換和配合，策略在革命底每個現有階段基礎上可以隨着革命底高潮或退潮，高潮或低潮而變更幾次。」又在「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一文說：「策略是戰略底一部分，它隸屬於戰略，為戰略服務，策略不涉及戰爭全部，祇涉及它的個別事故，各個鬥爭，各個戰役，如果戰略在於努力獲得全部戰爭的勝利或者——我們說——領導反對沙皇的鬥爭到終結，那末策略就在於努力在這個或那個戰役上，這個或那個鬥爭上取得勝利，勝利地執行這個或那個運動，這個或那個行動，而這些都或多或少地適應於一定的時機中鬥爭的具體情況。」又說：「策略底最重要的任務，在於決定鬥爭的手段和途徑，形式和方法，使其最適合於某個時機的具體情況而且最可靠地準備戰略的勝利，因此，策略底行動與其結果，都不應從它的本身，不應由直接效果的觀點去評價，而應由戰略底任務與可能性的觀點去評價。」

革命鬥爭的形式，是很多很繁複的，而這些形式跟着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變更，跟着各階級的狀態而變更，跟着政權的性質，以及國際關係等而變更。大抵可以分為下列數種：

(一) 秘密方式：這是和部分的罷工及示威運動相關連的。(二) 公開方式，這是和羣衆的政治罷工及示威運動相關連的。(三) 國會方式：這是和國會外的鬥爭方式及運動相關連的。(四) 武裝方式：這就是武裝暴動和羣衆的總同盟罷工相融合。(五) 國家方式，這是革命

黨已得政權之後的政府方式。

秘密方式，適用於專制政治的環境裏。但在特別情形之下，即是階級鬥爭極端急烈的時候，即使在資產階級或民主政治或立憲制度的民主政治之下，也要實行秘密方式。公開方式，是完全要看公開可能的多少而定其公開鬥爭的規模分量和作用，如果各種公開可能之中，有國會方式的鬥爭，自然也要用他，不過革命鬥爭的重心，始終是在國會之外的行動。無產階級政黨參加國會，是因為要在資產階級政權機關裏有自己的偵探，是因為要得到自己仇敵的罪狀而暴露他們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對於國會的策略，實際上是取消國會制度的策略；他之要參加國會，就是要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及國會。武裝方式，是要達到戰術上目的所不可避免的方式，等到要實行戰術的總攻擊的時候，武裝的鬥爭方式就要成爲最重要的鬥爭；不過在武裝鬥爭之前，應當先有教育羣衆，取得羣衆，組織羣衆的工作；所謂操練他們，例如羣衆的政治罷工，羣衆的普通示威，以至於武裝示威，都是。國家方式，是革命者取得政權後所用；憲法也是鬥爭的國家方式之一，不過憲法遠需要武裝的力量來維護他，同時這些國家方式的鬥爭，也應用到國外的戰線上，因爲無產階級國家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裏，無產階級應當利用國家方式的鬥爭，去促進並組織無產階級的國際革命。

此外還有暴力革命，也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避免的革命鬥爭方法；就是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以後，爲了鎮壓反革命，暴力仍是必要。

以上這些，是馬克思，昂格思，列寧，史太林諸人的革命方法論，爲中共戰略策略思想

之所自本，必須要先知知道的。

三、中共各時期之戰略與策略

甲、從民國十一年七月至民國十六年八月

中共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民國十年七月，中共的戰略與策略，本應從民國十年說起，因為當時祇有黨員六十餘人，而黨員又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第三國際羽翼之下，成立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列主義，並無深刻認識，其所主張，不知與馬列主義相差幾千萬里，故中共自編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百頁說：「因各種關係，中共宣言沒有討論（原起草之宣言，會後以小冊子形式印發），大會僅討論與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章程。」那有第一次代表大會，不討論大會宣言，遂以小冊子形式印發之理，可見其定有不可告人之隱了，因為中共自己要撕毀這段歷史，我們也就不再提他。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十一年七月舉行，討論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與黨的戰略路線，通過了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從這宣言，知道中共戰略目標，是在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貧農，其次是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和幼稚的資產階級，力量的佈置計劃，是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因此大會以後月餘，中共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建立一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因為中共這時祇有黨員百八左右，不為社會之所重視，想藉聯席會議，抬高自己地位，未能開成，然在是年九月，國

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滬召集各省同志，共商改組黨務，陳獨秀已獲派為修改黨章起草委員之一，可見中共和國民黨已有相當聯繫了。這時中共鬥爭形式，是採取秘密和公開兩種形式。特別注重工人運動，各大都市，時有工人罷工之事發生。

民十二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遵依是年一月十二日第三國際執委的特別決議，確定了一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一的策略，但在加入之後不久，第三國際即指示中共，發展自己組織，分散國民黨勢力，中共遵承國際意旨，有所謂一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領袖陳獨秀且有分散中國國民黨力量的三項原則之擬訂，其原則如下：（一）對國民黨黨員：取分化挑撥吸收和各個擊破的策略。（二）對國民黨主義：暗示國民黨黨員及民衆懷疑和批評。（三）對國民黨組織：操縱中央，抓住下層。上三原則，顯然是和他原先力量的佈置計劃相違背了，可見中共是祇顧目前利益，不顧革命大計的。民十三年六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就中共對本黨之陰謀，提出彈劾共產黨員案，其時孫總理尚在，共產黨員尚不敢過於跋扈，民十四年一月，中共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已由十二年的三百人增加為九百人，大會決議：一在民族解放運動統一戰線階段之後，接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一可見其亟欲分裂國民黨；操縱國民黨，奪奪黨權之用意了。孫總理逝世，國民黨喪失導師，而中共藉五卅工人運動，發展甚快，第三國際祕令中共篡奪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左派右派，即在此時由中共代為製成，民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有中山艦事變，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有上海工人與軍隊激戰，可見中共已擬採用武裝方式，對付國民黨，因均迅速

失敗，故在表面上，仍唱國共合作，以取得合法地位；公開活動。這一期內，他的重要口號，有「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國共合作到底」等。

乙、從民國十六年八月到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南京方面清黨，武漢方面，汪精衛還與中共勾結很密。第三國際派來中國代表魯易，誤認汪精衛為真傾向於共產主義，遂將民十五年年底第三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出示於汪，內有「土地革命不要政府下令，而先領導自發之沒收土地運動。」「改造國民黨組織。」「消滅國民黨之忠實將領。」「在國民黨中央，增加新領袖代替老領袖。」「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農份子。」「工農軍的土地不沒收。」等項，武漢政府遂於七月十五日，舉行分共會議，八月一日，共黨在南昌暴動，組織所謂「中國革命委員會」，但在當時，還是假借國民革命名義，推舉國民黨宋慶齡，于右任，譚延闓等為其革命委員會委員，還想和國民黨南京、武漢兩方，互爭正統，到了八七特別會議（南昌暴動後七日），方才公開的改訂戰略：「推翻國民黨統治，並消滅國民黨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時期，中共策略，前後頗有不同，前期從民十六年八七會議至民二十二年年底，其策略為「鼓動階級鬥爭，煽動罷工，實施恐怖政策，在農村中，則普遍進行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稅，並鼓動兵變及農民暴動，爭取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如吳秋白領導下之自衛主義，李立三領導下之立三路線，陳紹禹領導下之國際路線，大致都是一樣。後期從民二十三年一月第二次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至民二十四年八

月，其策略爲改中華蘇維埃政府爲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使小資產階級亦能參加選舉，富農亦能分有土地，享有公民權，係由毛澤東領導。（毛係實力派首領，在二十三年一月被選爲僞中央政府主席，在此時期，黨權仍在國際派手，但已不能控制軍政。）鬥爭形式，仍用武裝方式，所提口號，前期爲「打倒國民黨」，「推翻國民政府」，「反對三民主義」，「武裝農民，抗租抗稅」，「工人及貧農專政」，「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後期則將「工人及貧農專政」，改爲「工人與農民專政」，餘皆如前。

丙、從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至民二十六年九月。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中共會經通電，以民主自由和對日作戰來號召，然其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換言之，即對其叛逆搗亂行爲，停止圍剿討伐，純係一時緩兵之計，中央未理；民二十四年，五次圍剿，廣昌建寧，均被國軍收復，僞都瑞金，下在旦夕，中共遂以國難爲名，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主張。同時蘇聯因爲德國自一九三三年希特拉當政以後，以反共爲標榜，日意同聲附和；在國際上感受威脅，乃於一九三五年（民二十四年）八月，在莫斯科召集七年不曾開會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以反德反日爲號召，決定建立與擴大人民陣線運動，以打擊法西斯的狂潮，指示中共改變其十年來在中國所表演的行動，以響應國際號召，維護蘇聯利益。中共之政治路線，乃不能不因之而有劇烈轉變，從前鬧得轟轟烈烈的普羅文學運動，忽一變而爲國防文學運動，即其轉變之一明證。是年十月，開始長逃。（中共叫做長征）至十二月，在長逃中，又發表一個

決議，提出「民族統一戰線」口號，從前主張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的中共，現在也要民族抗戰了；從前主張分裂，主張爭取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的中共，現在也要主張統一了。到民二十五年八月，又發表「致中國國民書」，主張蘇維埃政府可以取消，爲着團結抗日，可以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因爲到這時候，中共實在是沒有武裝反抗的力量；武裝方式，不能不暫時放棄了。

這期戰略，從他自己的宣言看來，戰略目標是抗日，力量佈置計劃是聯合各黨各派，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其提出之口號，起初是「反蔣抗日」，其後是「迫蔣抗日」，最後是「聯蔣抗日」與「國共合作」，「似乎比之以前正確；然從解放社編譯（民二十七年出版）的「戰略與策略」去研究；從聯共黨史中共黨史去觀察，則知中共這期所改變的是策略而不是戰略，實際的戰略目標，仍然是國民黨，因爲時代正是「革命低潮」，不能不提出抗日策略，以停止國民黨軍隊進攻，建立人民陣線（後改爲統一戰線），以策應蘇聯的外交，提出「中國人打中國人」，「共同抗日」，「停止內戰」諸口號，以搖動國軍（如策動西安事變即是）。史太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論戰略的指導說：「當敵人力量強大，退守必不可免，受敵人強迫而去迎戰，是顯然不利的時候，當在某時的力量對比之下，祇有退守，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且保留其後備軍的時候，——那時候就要很巧妙地運用後備軍，以便作正確的退守。」又說：「這種戰略的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圖後來向敵人進攻。」正是中共這一時期戰略策略的最好說明。

丁、從民二十六年九月至現在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戰事發生，八月十三日，淞滬戰爭繼起，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宣言，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二）實現民權政治。（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同時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從這宣言看來，中共的政治路線，似已澈底改變，他的戰略目標，顯然不在對內而在對外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然其真意，並不如此。二十六年張浩（卽林彪之兄林毓英）所講之「中共的策略路線」云：「現在妥協是與獨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名義，推翻國民政府，以期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中共「黨的建設」云：「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上，擴大與鞏固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是準備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最基本的條件。」二十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所發訓令，中云：「此次抗戰，是本黨樹立政權之機會，……爲本黨與國民黨生死鬥爭底最後關頭，……要知站在黨的立場，主義的立場，決無朋友可言，希望全體同志，體會黨的意旨，站住腳步，無論到什麼情形，對於內心主張，絕不能讓步。」可見中共在理論上，是主張「由民族革命達到社會革命

他的真的戰略目標，依然是中國國民黨。

這一時期，中共配合戰略的策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妥協階段，他的勢力不如國民黨，表示投降，服從中央，信奉三民主義，堅決抗日，以圖發展勢力。第二階段是相持階段，他的勢力發展至與國民黨相持的形勢，到處襲擊國軍，併吞弱小，侵略地盤，準備與國民黨分裂，等待所謂突然事變之到來。第三階段是反攻階段，即是實行向國民黨反攻時期。以戰後十八集團軍的行動看來，自七七抗戰至武漢撤守，爲第一階段，自武漢撤守至現在，爲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呢，因爲第二階段還沒有充分完成，所以還在等待。他的口號，在第一階段，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國共共同抗日」，以博得國民黨及國人之同情。第二階段是「打倒頑固分子」（國民黨忠實黨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抵抗一切反共勢力的進攻」，以淆亂大後方人民之視聽，並向國民黨示威。無論是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他的決策，都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其門等形式，第一階段是採取公開方式，國會方式（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階段採取武裝方式，於可能時，利用公開方式和國會方式。

四、中共戰略與策路之荒謬

從上面這些事實，和中共自己言論，知道中共的戰略原則如下：

1、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及貧苦之農民。

2、革命的主要後備軍，是廣大中農和小資產階級。

8、革命對象，是封建勢力（地主階級與其政治代表——軍閥）及與封建勢力建立反動聯盟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指國民黨）。

這是中共二十年來，一貫的戰略原則，凡是懂得理論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荒謬的。他之荒謬所在，第一是未根據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綱領（馬克思主義之不正確，姑且不論），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共產國際的規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和階級分化顯明的社會，無產階級達到自覺和團結的意識與行動時而形成的產物，中國社會遠中共自稱是半封建社會，何來產生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更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他之所謂反帝反封建，實際都是中國國民黨所已作和正在作着的工作，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無涉。他之加入中國國民黨，從中國革命的需要看來，是應當的，照馬列主義的術語說，卻是所謂兩面派。加入以來，不依照自己的誓言，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遵行國際的旨意，為黨奪權政權的行動，更背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說：「共產黨最鄙薄隱祕自己的政見和目標。」而為真馬克思主義者之所鄙薄厭惡。清黨以後，搖身一變而為「上山共產黨」，在上海張貼標說，鼓動工人，「到井崗山去」，「到蘇區去（江西匪區）」，更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不知相去其幾千萬里了。第二是未根據於中國的客觀環境，既未注意中國工人的鬥爭經驗，也未把握某個時機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性質，缺乏正確的認識，故有「反蔣抗日」，「迫蔣抗日」，「擁蔣抗日」，前後自相矛盾的種種口號，正如中共中央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所說：「對於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

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尙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澈底認識。」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也比我黨所瞭解的豐富得多。」

因為這種原故，中共二十年來的戰略與策略，乃如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所說：「把感想代政策」，無處而不碰壁，自從民國九年五月中共成立到現在，是整整的二十四年，民國十六年八七會議以前，是陳獨秀以家長式姿態主持一切，中共把他稱為右傾的機會主義，八七會議到民十七年八月六次會議，是瞿秋白負責領導，中共稱他為盲動主義，六次大會到民二十年一月四中全會，名義上是向忠發為之領導，實際上是李立三及其黨徒發號施令，中共稱他為左傾的機會主義或立三路線，四中全會到民二十四年一月遵義會議，是陳紹禹秦邦憲等留俄派，主持中央，中共稱他為國際路線。（自李立三下台以後，中共中央已不能完全控制實力派，自民二十三年一月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實力派實際上已控制了黨，中共最近把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稱為國際路線，是有意將江西失敗責任推諉於國際派），從遵義會議到現在，是毛澤東獨握大權。據中共自己所說，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立三路線，國際路線，都有嚴重錯誤，祇有現在的毛澤東路線，是絕對正確，據我看來，這完全是成王敗寇之見，中共過去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現在的政治路線，依然是錯誤，錯誤的癥結，就是在於他把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認為是資產階級政黨，定為戰略目標，他的戰略與策略，始終是不顧中國的客觀環境，也不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綱領底結果出

發。

九八

民國十八年，陳獨秀因中東路事件，反對中共中央的主張，被開除黨籍，聯合托派和其他被開除的共產黨員，發出政治意見書，大意謂中國此後若干年中是沒有革命的，須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方有革命的高潮來臨。因此主張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從新再來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平秘密，培養革命力量，等待機會再幹，取消紅軍，蘇維埃，解散一切武裝，取消罷工，遊行，示威，努力生產發展，幫助民修資本。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中共中央認為該意見書內，所羅列的政治主張，為取消中國革命的主張，稱之為取消派，以示譏刺之意，陳氏這一個意見書，動機是否良善，我們不敢斷定，單從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綱領去看，是非常正確的。事實證明，中共在九年上山，二萬五千里長途之後，無可奈何之時，畢竟採納了陳氏意見，向中國國民黨送上一道降表，這就是所謂民國二十五年八月，「致中國國民黨書」，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宣言。然而中共還是一意猶存，野心不死，抗戰以來，雖然是戴着抗日的面具，始終是夾着武力奪取政權的尾巴，口喊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是破壞了民族統一戰線，難道又要到最後向武力低頭，而不在事先向真理認輸麼？撫今思昔，不禁感慨繫之。

附註：據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機會主義的錯誤，主要的有三

種：（一）缺乏獨立性與批評性。（二）不瞭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三）黨沒有成爲廣大羣衆革命力量的中心，——這三個主要的根本錯誤是：無產階級政黨

缺乏獨立性與批評性，不了解由這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的轉變，阻礙了各方發展的羣
未運動。一

中共之三十六計

一〇〇

一、蒼蠅附驥：中共在民十二年，知道自己的共產主義，不為國人歡迎，要求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效力，自從民九中共成立，到民十二加入國民黨時，他的黨員，祇有六十餘人擴充到三百人，加入國民黨以後，隨着國民革命勢力發展，三年之中，黨員增加到八千人之多，其中如吳玉章，譚平山，毛澤東，張國燾，惲代英，周恩來等，都以三四流的文章，一躍而為政治舞台上的紅人，可說是蒼蠅附驥，一日千里。

二、借屍還魂：民國二十五年，中共竄至陝北，殘餘力量，不過二萬六千，已成釜底游魚，深知共產主義與暴動政策，為國人之所痛惡，時值抗戰軍興，乃以抗日為名，請求中央收編，實則毫無誠意，抗戰初期，中共高唱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不出二年，便在河北，山西，山東各地，拚命進攻抗日部隊，是其明證。

三、指鹿為馬：民國二十六年，毛澤東在解放週刊上說：「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澈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別的，這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無疑的是澈底的民生主義。」民國二十八年，洛甫在解放週刊也說：「陝甘寧邊區的特殊，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一句話說來就是它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均是指鹿為馬，自欺欺人。

四、看風使舵：中共內部相互攻擊，有一個慣用語，就是「機會主義」，雖自蘇聯學來

，比之蘇聯，使用更濫，既有了右傾機會主義，又有了左傾機會主義，連毛澤東也曾一度被認為右傾的機會主義，似乎中共是很反對機會主義的，實際中共過去的政治路線，還不止是機會主義，簡直是投機主義，加入國民黨，篡奪黨權政權，土地革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政治投機，中山疆事變，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井崗山落草，是軍事投機，傾廬布，打土豪，種鴉片，販仇貨，是經濟投機，喊民主，叫進步，談抗日，是社會投機，無時無地，不是看風使舵，十足的投機主義。

五、借刀殺人：借刀殺人，是中共常用手段，對黨外如此，對黨內亦然，李立三之殺憚代莫，猶為間接借刀，何夢雄派因為反對陳紹禹之留俄派，派出工作之後，隨即使人向政府告密，都作了無頭之鬼，則是直接借刀，此之李立三更為毒辣了。

六、乘火打劫：九一八事變，國難嚴重，中共卻乘外患機會，攻贛州，陷南雄，佔漳州，益發猖獗，抗戰二年，武漢廣州失守，汪逆精衛附敵。抗戰進入艱苦階段，中共卻在河北，山西，山東，瘋狂似的進攻國軍和抗日民軍，都是乘火打劫行爲，毫無民族國家意識。

七、瞞天過海：中共在暴動政策失敗以後，知道全國人民，對於中共，都懷恐怖心理，抗戰開始，乃大辦其學校，努力於宣傳工作，如所謂「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名詞怪好聽的，實際是公學不公，學院不學，抗日不抗，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製造所，瞞天過海而已。

八、上樓抽梯：中共在吸收黨員之時，盡其拉攏之能事，迨其一經加入組織，立刻放下面孔，施以種種的約束，剝奪個人意志，又在引誘青年奔赴陝北，及欺騙抗大學生渡河之際，亦用同樣手段，誠所謂上樓抽梯也。

九、調虎離山：中共的老幹部或高級幹部，都是些色中餓鬼，看見了下級幹部或老鄉家的太太，生得稍好，一時不易下入，便用調虎離山之計，假託工作爲名，將女的調開家庭，或者是將他丈夫支遣出去，以便進攻，這種勾當，幹得多了，下級幹部和士兵，便也起來效尤，八路軍在前線，每到一個鄉村，便把男壯丁遣發到外邊去充當扶役，等到晚間，藉口組訓民衆，這令青年男女編組成隊，帶至山溝，去担任放哨工作，就在放哨時候，幹起游擊戰來。

十、將蝦釣起：中共在宣傳上和交際應酬上，最不吝嗇，其目的即在將蝦釣起，花一本錢，得大便宜，局外之人，鮮不入其圈套。

十一、化整爲零：中共在情況緊急之際，馬上將部隊疏散，改頭換面，叫做化整爲零，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就是他這個詭計，不但用之於退兵，也引之於進攻，不但自己化整爲零，也把他人化整爲零，如他攻擊國民黨，說國民黨內某某人是親日份子，某某人是法西斯蒂份子，卽其一例。

十二、旋磨打轉：旋磨打轉，就是孫子所謂「以迂爲直」，用許多曲折方法，達到最後目的，好像汽車上山一樣，在政治上，在軍事上，中共都是常用的。

十三、鬼火狐鳴：民三十年，西康省兩鹽邊境，曾發現大股神匪，並有一怪人，身著皮上裝，背負寶劍兩口，腰圍大旗一面，手携天書兩冊，鐵禪杖一支，自謂「刀劍不能入身」，但當其對人談話時，總說「毛澤東是真命人主，現西藏十八土司，已推毛澤東登位。」又在陝北綏德，當地人民，對於中共強征暴斂，頗發怨言。一日，忽有英美記者數人，前往該縣參觀，縣政府集合民衆二萬餘人，開會歡迎，英美記者相繼登台演說，對於重慶西安政治，深表不滿，對於陝北邊區，則譽不絕口，認爲是抗戰樂土。民主楷模，事後乃知所謂英美記者，均係抗大學生化妝也。

十四、殺雞求卵：殺雞求卵，是很大的失計，中共卻不知雞，戰前破壞都市，毀滅農村，以求顛覆政府，奪取政權，戰後販運仇貨，栽種鴉片，以開財源，而擴軍隊，都是這種行爲。

十五、望梅止渴：望梅止渴，雖非長久之計，亦可以救一時之急，中共在邊區以外，則宣傳邊區以內，如何自由平等，以鼓勵青年，進入邊區，入了邊區，則謂加入中共組織，前途如何光明，事業如何獲得保障，以引誘其加入組織，加入組織以後，則竭力宣揚蘇聯人民幸福，和中國將使社會革命成功後的快樂，就是這種作用。

十六、裏應外合：中共在和敵人作戰時候，常常先派黨員或忠實可靠之幹部，加入敵人隊伍中去，等到攻擊時候一到，馬上起來響應，潛黨以前，派李大劍，毛澤東等加入本黨，破壞本黨，抗戰以後，派抗大學生進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破壞民大，以及消滅

抗日民軍，都是如此。

十七、含血噴人：中共是慣於造謠的，他的造謠本領之大，不但是無中生有，而且嫁禍於人，含血噴人。民二十八年六月，中央戰地視察員到冀中時，中共軍政首領，召開歡迎大會，席間忽有一土著婦人登台哭訴，河北民軍張蔭梧部劫奪其結婚首飾，要求視察員代向張指揮索回，經視察員詳細盤詰調查，乃知此婦人即係軍區婦女部長，意在誣蔑張部民軍紀律廢弛。又在江南之前新四軍，亦常派遣部隊，穿著友軍服裝，佩戴友軍符號臂章，出外劫掠，既發混財，又壞友軍名譽，以爲進攻友軍口實。

一八、移花接木：共產主義雖然不是如中共所說：「放之四海而皆準」，然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總算是一藥病的猛劑，中國社會，和歐美社會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人，卻要把他勉強輸入，正如梁任公氏所說：「折鄰圃之繁花，插吾家之老幹。」不但是花栽不成，連木也活不了的。

一九、笑裏藏刀：抗戰以來，中共製造了許多口號，如「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表面是十分漂亮，實際是以「團結」掩護他的割據，以「進步」引誘青年，以「抗戰」擴大邊區，處處是笑裏藏刀。至於中外新聞記者或訪員，到延安或十八集團軍所在地去訪問的，表面上是表示得無限歡迎；背地裏卻在慢罵「帝國主義的偵探者」，「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不是參加過中共組織的人是不能知道的。

二〇、金彈脫殼：中共爲掩護其組織起見，常於核心組織之外，成立許多外圍組織，等到這一外圍組織，已爲社會所知，便又另成立一外圍組織，如同金彈脫殼一樣；抗戰初起時之民先隊，現在改變爲青年解放社，即其一例。

二一、釜底抽薪：中共二十年來，有好幾次受過重大打擊，仍能存在，釜底抽薪，亦其原因之一，民十五年，中山艦事變以後，國民黨中央，對於共產黨勢力，曾加裁抑，定跨黨份子，不得爲國民黨最高級黨部部长，然未一年，共黨又復擴張於國民黨內，則以其勾結所謂左派，徐謙等人，拉攏投機份子汪精衛，爲之明目張胆也。江西剿匪時，煽動孫連仲部叛變，陝西剿匪時，煽動張楊事變，均於革命軍事，破壞甚大，而中共則反因之苟延殘喘焉。

二二、逼上梁山：歷史上的流寇，從黃巢秦宗權以來，有一個傳統的策略，就是殺人放火，把農村破壞不堪，使農村壯丁非跟他們去不可，這策略後來叫做逼上梁山，中共之圍剿魯迅，迫其入黨，逼迫江西農民，使其加入紅軍，逼迫華北民軍，使其改爲十八集團軍，也是如此。

二三、虛張聲勢：中共在暴動時期，常常派幾個人，在黑夜張貼標語，一夜之間，把一個都市都貼滿了，許多人以為中共聲勢浩大，實際不過幾人而已，抗戰以後，游而不擊，今天在甲地出現，明天在乙地出現，許多人以為十八集團軍無處不有，實際還是少數部隊，東竄西竄而已。

二四、過渡折橋：過渡折橋，也是中共常用手段，民十六年上半年，利用鄧演達等親持國民黨，發展勢力，清黨分共以後，鄧氏失勢，立刻放下面孔，予以無情打擊，毛澤東在初上井崗上時，利用土匪頭王佐袁文，等到自己勢力鞏固，便使彭德懷火併袁王，十八集團軍勢力伸入河北之初，利用民軍呂正操爲之驅除，等到張蔭梧喬明禮諸部，都被解決，呂正操的冀中王，也就塌台，因爲中共對於外人，都是利用性質，用不着時，立刻毀掉，以免將來，又被旁人利用哪。

二五、避實擊虛：敵人集中此處，則他處兵力較薄，十八集團軍即猛攻其弱點，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而自己損失甚小，在政治上，則對中國國民黨之優點，一字不提，而缺點則儘量擴大宣傳，以減低民衆對國民黨之信仰。

二六、分進合擊：中共部隊，當被攻或進攻時，常常命令各部隊同時發動，從各方面應戰或求戰，在宣傳戰上，亦是如此。

二七、孤軍深入：中共在作戰時，常派少數堅強部隊，晝伏夜行，封鎖宿營村莊消息，進入敵人的中心區或大後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經得手，立刻化整爲零，轉回原地，或到指定之地集合，在組織上，則派少數堅強黨員，打入國民黨或各種行政機關，刺探消息，發展組織，相機破壞。

二八、聲東擊西：中共在江西時，常以一部紅軍（一排爲單位），驅使三四百赤化羣衆，各執紅旗，佔領四面山頂，利用農工武器，土砲，刀子，喇叭，在遍山遍野吶喊，夜

間則各山頂舉火，設疑兵以擾亂國軍，而以另一主力出擊，在二萬五千里長逃時，爲脫離追勦計，常以紅軍一部，離國軍追擊部隊四五里，引其走入大道，而以大隊取間道逃走，皆古人所謂聲東擊西之應用也。

二九、補風捉影：長城各口戰役以後，軍政部長何應欽，曾經北上。代表中央，簽訂何梅協定，以爲一時緩兵之計，中共因此，遂稱何部長爲親日派，抗戰初起，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頗多，中共因此，又向英美蘇法宣傳，何部長爲親德派，捕風捉影，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

三〇、順手牽羊：行軍作戰，士兵官長隨便拿老百姓的東西，這是十八集團軍常有之事，然其最爲人們所厭惡的，猶不在物而在於人，常常籍口解放婦女，婚姻自由，把人家的女媳帶跑，利用「前進」「革命」諸詞，把人家子弟騙走，乘着敵人進攻國軍之際，收繳友軍落伍士兵槍支，真是無賴之尤。

三一、釣名沽譽：十八集團軍，初到一個地方，必定要打一次仗，並且打得頗爲認真，名號作「慎重初戰」，以博得民衆信仰；以後，便是敵來我退，敵退我進，敵不見我，我不見敵，進行所謂游而不擊了。

三二、托梁換柱：中共在「上山」一時代，對於三民主義，祇毀不遺餘力；逃竄以來，知道三民主義已爲國民所堅定信仰，不可搖動，乃將國民黨孫總理言論和蔣總裁言論對立起來，把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牽強附會起來，把中國國民黨的光榮歷史和中共行爲聯

繫起來，就是一種托梁換柱之計。陳伯達在評中國之命運說：「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國從來以至洪秀全，孫中山一切優良的革命的傳統，而一切反動派（指一切反共的）則繼承會國藩，葉德輝的傳統。」即其一例。

三三、縱金行間：中共爲着爭取民軍僞軍和歷史關係較淺的國軍，常常不惜重金，買通方左右，代爲刁撥離間，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

三四、香陣迷魂：中共爲勾引外人入黨，或者是刺探消息，偷學技能，常常派一大批女人去將對方包圍，不是這一個引你走入圈套，就是那一個將你俘虜，使你俯首就範，等到目的已經達到，也就是酒醒月明人散的時候到了。

三五、斷臂取信：斷臂取信，亦叫苦肉之計。中共派遣特務人員，打入對方機關，爲求得得信任，特別表示效忠，或竟出賣同夥，以爲自己行爲掩護，以圖求得更大之代價焉。

三六、走爲上計：中共在戰術上，有一個常用口號，就是不打硬仗，不打硬仗的方法就是走，去如脫兔，來如飄風，神出鬼沒，使你捉摸不定，毛澤東說：「馬列主義就是爬山」，馬列主義雖不是爬山，中共的最大本領是爬山而跑，卻是真的。

陳伯達在評中國之命運一書說：「中國共產黨人，和民衆在一起，堅苦奮鬥……保存了中國最優秀的民族精神。」又說：「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國從來……一切優良的革命的傳統。」大概就是得繼承這些陰謀奇計而說的吧！

二十一年來之中國

版權所有

著者：李 廣 平

發行者：正義出版社

印刷者：電工印刷廠

西安北教場公字二號

發行所：建新書店

西安西大街八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日初版

每册定價伍拾元

